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3年  
第4期  
总第70期

准印证号（甘）LK620005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编辑手记

暮冬天地闭,正柔木冻折,瑞雪飘飞。清冬时节,今年最后一期杂志如约而至。古人云: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说的正是冬日红袖添香、开卷有益的读书之美。习近平总书记在读者出版集团考察时曾讲道:“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凸显了对国人捧卷生香的时代期许。

“本期特稿”专栏,我们奉上的是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林怀艺先生的大作《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探析》,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历来包含“抵御渗透”的内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关系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关系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关系到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全文回顾了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历程,剖析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重大意义,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六个着力点。这是我刊践行习近平同志“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讲话(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工作实效。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栏里,我们推出两篇文章。甘肃社院王雄刚博士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的分析》一文中提出:“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我们由衷地期望本文能够为当前“中国之治”的深入推进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与智力支撑。

“统战理论与实践”是我刊的重点栏目,本期共刊发6篇佳作。闫脑吾副教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政治优势与运作逻辑》系2023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21届政党年会参会主旨发言论文,作者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政治策略和表现,是活学活用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产物。整篇文章从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禀赋、统一战线运作逻辑、统一战线的政治效能三方面揭示了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统一战线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挖掘和理解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优势及策略并进行相关对策的思考,既是学理理性的使命,也是统一战线的责任。

责任编辑:王昊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3 年第 4 期(总第 70 期)

封面题字：何鲁鹿

#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 目 录

主管单位: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孙雪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真 王亚莉

石岱千 刘仲奎

李晓霞 张耀宇

杜怀明 尚勋武

苟天宏 郁川虎

赵金云 赵凌云

郭天康 姬安岳

秦 禾 秦忙龙

敏隆邦 葛建团

蒲晓贞 霍卫平

### 统战理论新思维

论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等三则

..... (4)

### 本期特稿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探析 ..... 林怀艺(6)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基于“国家—社会”互构视角的分析 ..... 王雄刚(11)

始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 刘良军(23)

### 统战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政治优势与运作逻辑 ..... 闫脑吾(25)

更好发挥民建在人民政协作用机制思考 ..... 梁晓宇 黄 鲁(35)

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研究——以甘肃民盟组织为例

..... 鲜新莲 王 昊 郭文君 刘 燕 胡冰梓月(39)

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逻辑关联 ..... 吉伟涛(46)

缅怀纪念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诞辰 157 年,追忆先贤,续写未竟事业

..... 王书波 闫丽琴(51)

2023年第4期(总第70期)

2023年12月20日

天下无战——推动新时代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思考

——写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 ..... 张 晨(53)

中华文化研究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合建设 ..... 杨建平(57)

统一战线的中华“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 王 凯(62)

黄河文化的优秀特质及现代转化 ..... 刘树升(67)

武威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挫折 ..... 毛秀花(72)

资政建言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赋能我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 万代红(75)

部长论坛

发挥法宝作用 助力追赶发展

——临洮县统一战线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 王 涛(77)

主 编:王亚莉

编辑部主任:蒲富平

编辑部副主任:王 昊

执行编辑:王 昊

卢婉春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818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634058

0931-7783804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 统战理论新思维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允熠于2023年第5期《青年学报》发表文章《论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提出:中华文明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和现代创造力,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特质,二者相辅相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里出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中既包含着“文化”与“文明”的细微差异,又基本同义,都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其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文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呈现的时代精神的整体性风貌。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于注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属性而成为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文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开放胸襟,努力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2023年《政治学研究》第5期刊登中央统战部张献生先生文章《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鲜明特色和强大动力。研究和把握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规律,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是实现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为中国政治学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团结是统一战线与生俱来的基因,在实现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团结是不同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目标和利益形成的聚合力,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能。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团结是统一战线的鲜明特征和永恒主题,也是统一战线能够成为凝心聚力重要法宝的核心要素。研究探索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规律,构建中国共产党“团结学”,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首先要深刻认识团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要认识到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执政兴国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心力量支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广泛团结的重要论述,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团结学”的基石。团结作为形成共同体的聚合力,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中,着眼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结合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际,就建立统一战

线、实现广泛团结作了许多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科学指南,并成为团结党外人士、构建“团结学”的重要基石。

三、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探索和总结,为构建党的“团结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形成政治凝聚力,团结各方面党外人士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共同奋斗,是党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最大政治问题,贯穿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全过程,体现在党领导各方面社会成员共同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历代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从确立政治战略、发挥政治优势、进行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发展的高度,围绕为什么要团结党外人士、如何团结党外人士、怎样发挥党外人士作用这个主题,进行长期实践、探索和总结,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和政策策略,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研究总结团结党外人士工作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宝贵资源,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政治学的内涵,是构建“团结学”的根本指导、理论基础和重要遵循。

四、团结党外人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和政治过程,需要在新时代进一步探索总结升华,使“团结学”不断丰富完善。团结党外人士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任务,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政治过程。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为团结党外人士和“团结学”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也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政治学的内涵;其二,研究把握党外人士性质、构

成和特点的发展变化,实现党的“团结学”的与时俱进、丰富完善,形成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的政治凝聚力;其三,研究把握统一战线所处的时与势以及统一战线历史方位的变化,充实丰富党的“团结学”的内涵;其四,研究把握党外人士生活方式的变化,努力提高团结党外人士的成效,为党的“团结学”提供科学因子。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张耀影在《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4期撰文《黄河文化价值实现与传播路径研究——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指出:黄河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其一,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古代属于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几千年来,黄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造就了极为丰富的黄河文化,包括上游的河湟文化、陇右文化,中游的河套文化、泾渭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内文化,下游的河济文化、中原文化、黄淮文化、汶泗文化,等等。华夏文明通过不断吸收各地域的文化,使得这些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引下,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推动黄河文化创新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对内部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整合,发挥各自文化的优势,并在共同体中不断地增加文化自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黄河文化的重要性将为更多的人关注和熟知。特别是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黄河文化将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得以更好传承。

责任编辑:王昊

#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探析

林怀艺

**【摘要】**不论是从国际共运史还是从中共党史看,抵御境外宗教渗透都是共产党人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历来包含“抵御渗透”的内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关系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关系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关系到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着力点,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精准施策、坚持法治德治并举、坚持以导的理念做好宗教工作、坚持依靠包括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加强“抵御渗透”的学理研究。

**【关键词】**新时代 党的宗教工作 “抵御渗透”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历来包含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简称“抵御渗透”)的内容,也就是抵御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本文拟就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 一、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历史回顾

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地球上建立起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将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设想付诸实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和斗争随之展开。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各种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分化”,而宗教就是其常用的一种渗透“武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反共并不是一项政策。它是一种信仰——信仰自由。”<sup>[1]</sup>其实,不论是尼克松希望的“不战而胜”,还是布热津斯基鼓吹的“大失败”,或是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都表达了运用

包括宗教在内的所谓“信仰自由”来赢得反共优势的企图。事实表明,苏东剧变的原因尽管非常复杂,但境外宗教渗透对其意识形态的崩溃起着一种极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这是前车之鉴啊!”<sup>[2]</sup>可以说,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共产党开展“抵御渗透”,伴随着党的发展历程:民主革命时期,“抵御渗透”是同反对列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利用传教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抵御渗透”是同支持基督教、天主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此后中国宗教界开始了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的进程;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宗教界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敏锐意识到国际宗教反动势力“重返中国大陆”的企图,1982年3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形成并由党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提出“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BKS116)

作者简介:林怀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势力的渗透”的任务,<sup>[3]</sup>并且对“抵御渗透”的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此后,这项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常抓不懈。1990年,陈云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渗透的情况深感不安,他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重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sup>[4]</sup>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政治眼光和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sup>[5]</sup>。当前,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表现,主要有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干涉我国宗教内部事务、在我国进行非法传教等,像“境外一些势力经常在我国高校开展活动,一些境外宗教组织以高校为重点开展渗透活动,还有宗教极端势力对一些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渗透”,<sup>[6]</sup>对高校的党建思政、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造成很大影响。习近平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明确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sup>[7]</sup>对新时代“抵御渗透”这场复杂、尖锐、长期的政治斗争进行了周密部署,增进了全党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

## 二、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重大意义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全党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sup>[8]</sup>这三个“来之不易”表明,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领导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通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实现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由此来看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关系到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和特色,是中国制度体系最大优势的集

中体现。习近平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中,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就包括坚持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往往打着“信仰”“人权”“自由”等幌子,但实质却是在与我党争夺信教群众和意识形态阵地,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领导核心地位,这就是政治问题、方向性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sup>[9]</sup>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是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因而对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推行的“松土工程”“灵魂战争”等图谋,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坚决与之进行斗争。

其次,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关系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sup>[10]</sup>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题中之义。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渗透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国土安全、国民安全等构成巨大威胁,破坏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征程上的“绊脚石”,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再次,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关系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使我国各宗教从“宗教在中国”自觉走向扎根本土的“中国宗教”,使我国宗教讲“中国话”、行“中国风”、守“中国心”,使信教群众觉得这样的宗教可亲、可爱、可敬。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就是要使我国宗教“去中国化”“逆本土化”,从而达到它们的政治意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所必须坚持的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其“五句话”都包含鲜明的“抵御渗透”指向,特别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要求筑牢防范和“抵御渗透”的堤坝,对那些试图插手我国宗教内部事务、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在宗教上的特权、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组织的行为坚决说“不”。我国宗教界开展宗教国际交流交往,也要建立在独立

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最后,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关系到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抵御渗透”不仅涉及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而且对宗教关系中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坚持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和违背公序良俗等,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对党的宗教工作的要求。习近平指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sup>[11]</sup>一旦在“抵御渗透”问题上出现薄弱环节,让境外势力在宗教关系上有机可乘,他们就会将一些本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无限放大,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这样会导致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难以建立。

### 三、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的着力点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需要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做到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工作篇”,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与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都涉及“抵御渗透”的重要内容和工作部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只有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体制,运用大统战工作格局、大思政工作格局来协同治理,才能更好把握宗教发展规律和宗教工作规律,精心做好“抵御渗透”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对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sup>[12]</sup>只有这样,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才能有主心骨和中流砥柱,才能形成正能量满满的志气、骨气、底气。

第二,坚持精准施策。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在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渠道,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突破口,在线上线下有不同的手段,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像对高校师生的渗透,就存在多股境外宗教势力同时发力(特别是基督教的学生团契)愈演愈烈、手段多样(特别是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行动隐蔽(特别是“文化交流”“学术探讨”“留学考察”等噱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习近平强调:“要结合各宗教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以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全局工作。”<sup>[13]</sup>“抵御渗透”同样要把握重点和全局的辩证关系,精准施策,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近年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开展的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就是要通过思政课这一主渠道,讲道理、明是非、知荣辱、辨美丑,提升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高校“抵御渗透”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坚持法治、德治并举。从宗教工作所应当遵循的原则看,“抵御渗透”是同“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打击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只有有效“抵御渗透”,才能真正“保护合法”。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抵御渗透”首先必须善于运用法治的武器,在完善以《宗教事务条例》为主体的涉及宗教事务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sup>[14]</sup>以此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此外,还要结合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增进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增进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致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俘虏。

第四,坚持以导的理念开展工作。对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来说,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是要“改造宗教、改变信仰”,而是要使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导的理念做好宗教工作,运用思想教育、文化引领、政策指导、行政管理、法律治理等手段,开展系统治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sup>[15]</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再加上党和政府支持各宗教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我国各宗教的思想建设一定能够在守正创新中焕发生机活力,塑造我国宗教温和、理性、包容的良好形象,从而自觉“抵御渗透”,进一步将周恩来提出的“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落到实处。<sup>[16]</sup>

第五,坚持依靠包括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习近平指出:“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sup>[17]</sup>这一论断决定了党和政府在“抵御渗透”的问题上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包括依靠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境外势力越是想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挑拨离间党和政府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关系,我们就越是要尊重群众宗教信仰,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相信、依靠他们,巩固同他们的统一战线,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由于信教群众“往往愿意听宗教界人士的话”,<sup>[18]</sup>因而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就非常重要。只要这支队伍按照全面从严治教、提升宗教修为、切实解决健康传承问题等要求,带领信教群众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就一定能够协助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中交出合格的答卷。

第六,坚持加强“抵御渗透”的学理研究。“抵御渗透”是一项日常工作,但从“宗教工作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工作”<sup>[19]</sup>的角度看,“抵御渗透”同样是一门科学,同样离不开实践基础上的学理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他要求“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sup>[20]</sup>并将“宗教学”纳入其中;习近平在202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

学学科建设”,<sup>[21]</sup>这对于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宗教学理论和学科,对于克服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宗教研究领域中“失语”“失踪”、“失声”的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抵御渗透”的学理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不可或缺内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况下,境外宗教渗透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包括我国“抵御渗透”的思路和对策就应当相应进行哪些调整,“抵御渗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何开展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以确保“抵御渗透”工作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政策供给,能够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进行。

#### 四、结语

环顾全球,当今世界80亿人口中有80%以上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对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局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也有多达2亿人口的信教群众,又由于我国各主要宗教大都具有世界性,与国外宗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一直处于中外宗教交流之中,因而不可否认国际上的宗教动态也会对国内宗教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等元素形成的中央集权型体制,决定了我国历史上“政主教从、国强教弱”的局面,中国缺乏宗教战争的土壤,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矛盾并不构成人们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加上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形成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因而在世界各国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宗教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宗教工作创新推进,也向世界贡献了这一方面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各族人民不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斗争中,都对形形色色的来自外部的渗透、颠覆和破坏保持着高度警惕,因而对于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开展“抵御渗透”,中国共产党具有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但是,当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际上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出于自己的

意识形态偏见或霸权霸道霸凌习惯,仍在试图动用包括宗教在内的力量对中国进行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围追堵截,这种困难、挑战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处理得不好就可能使自己陷于被动甚至给整个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虽然“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sup>[22]</sup>但是对于恪守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充分认识到在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中自觉开展“抵御渗透”的重大意义,并以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斗争精神采取积极有力的对策,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这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内在要求。

#### 参考文献

- [1][美].尼克松,谭朝清等译.1999:不战而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65.
-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9.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70.
- [4]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0.
- [6]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362.
-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7.
- [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45.
- [9]习近平.第一卷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0.

- [1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3.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0.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2.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1.
-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55.
-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6.
- [16]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4.
- [1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6.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69.
-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5.
- [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5.
- [21]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中国统一战线,2021(12).
- [22]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3-16.

责任编辑:王昊

#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王雄刚

**【摘要】**“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确实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关键词】**士绅传统 基层社会治理 “国家—社会”互构 中间阶层

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当前国内社会治理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学界将之概括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sup>[1]</sup>其中一个重要缘由是,社会中间力量发展不充分,造成政权与民众直接“照面”,在特殊场域易引发冲突。基于这样的困境,回溯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传统社会有较为成熟的士绅治理经验,士绅阶层充当着官民之间的“中介”,是地方权威的代表,促成了国家政权与基层自治组织融为一体,维系着社会基本面的长久平稳。近代已降,士绅传统之所以走向衰落,有其深刻的时代变革缘由,随着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经济基础的破坏,近代中国遭受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瓦解了孕育士绅的社会土壤,士绅阶层被迫转型或步入没落。

## 一、士绅与士绅传统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士绅阶层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士人阶层贯穿中国历史,是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中坚力量,构筑起了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沟通桥梁,消解着中唐以来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困境。<sup>[2]</sup>尽管这种沟通机制有时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总会复苏,且进一步扩张。<sup>[3]</sup>至宋

代,这一群体逐渐被称之为“乡绅”,明清时成长为“士绅”,获取了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对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一)何谓士绅

士绅,又称“乡绅”“绅士”“缙绅”等,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地位,并发挥独特功能。<sup>[4]</sup>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史,古史传说和文明的早期遵从选贤任能的“贤人政治”;进入夏商周,则转向宗法制、分封制下的“贵族政治”;秦一统“天下”后开启了郡县制基础上中央集权型“皇权政治”。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基于“封建”与“郡县”、“乡绅”与“国权”长时期的复杂关联,逐渐形成了皇权自上而下与地方自治权力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结构。<sup>[5]</sup>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开启,使得“双轨政治”结构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宋代时期,随着科举社会的成熟,通过科考的读书人逐渐在社会上占据特殊地位,出而仕宦,治理国家;居家不仕,则成为地方社会的领袖人物。到明清时期,士绅阶层的人口数量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就士绅身份的获取而言,与英国的绅士(gentry)不同,中国士绅的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教育而非土

**基金项目:**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西部地区新乡贤融入基层统战工作研究”(ZK20230228);甘肃社会主义学院2023年专项课题(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发展新乡贤基层协商民主路径研究”(GSSYZB202306)。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博士,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基层社会治理。

地与财富来获取,并且也不像英国绅士那样可以世代承袭。在张仲礼的研究中,整个绅士大致以学衔和功名划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集团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者组成,下层集团由生员、捐监生及其他有较低功名者组成。鉴于此,不论是通过科举“正途”,抑或捐纳“异途”,甚或低级功名者(生员),均属于绅士行列。<sup>[6]</sup>瞿同祖延续了“绅士”的概念,强调绅士阶层实质上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具体到清代的绅士,由两部分构成,即官员(包括现任、退休或革职者)和各级学衔获得者(包括文武两科)。<sup>[7]</sup>在费孝通和吴晗的研究中,绅士是指退任的官僚或者官僚的亲戚,他们虽在野,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但朝内有人,有势力(政治免疫性)。<sup>[8]</sup>当苛政猛于虎时,绅士们的“免疫性”和掩护作用等价值也愈大。

总体而言,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时段中形成的历史性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迁过程。“士绅”的称谓在清代时得以推广使用,主要是指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sup>[9]</sup>通过学术史梳理,中日学者偏重于士绅的身份(主要指官职、功名),美国学者则看重士绅的实际影响。概而论之,士绅这一群体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有鉴于此,可以说士绅是传统社会地方生活中的领袖,通常奔走活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旨在“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扶危济困,仲裁纠纷,督修和维护地方上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sup>[10]</sup>他们热衷于基层社会事务,一般代表地方利益参与当地的治安、税收,并就地方有关事务提出国策建议等。

士绅的来源主要是读书人。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境况往往与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新王朝开启,通常需要大量人才,读书人谋取功名比较容易。然而到了王朝的中后期,随着接受教育规模的扩大,生产出大量“儒生”,一时间人才趋于相对饱和,科考难度不断增大。这致使一些对仕途无望的儒生不得不转向通过其他手段来谋生,其中一部分成为私塾的塾师、官府中的刀笔小吏、富户豪门的管家,另一部分成为礼生、医生、商人等。事实上,这些未能出仕的读书人,其人生追求则是退而求其次,努力跻身士绅行列。

士绅贯穿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士绅群体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具体而言,“士”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绅”则是乡村读书人、文化人的代表,是某种势力、权威的化身。当然与普通乡贤不同,士绅阶层近似于官但又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这致使士绅身份的建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到了清代中期,士绅身份基本稳固下来,主要是指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构成。日常生活中,他们彰显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退休官员的清正廉洁、富商人士的开明豁达,在地方修桥补路、行医办学、解决纠纷等方面发挥着官府难以发挥的作用,从而赢得了“贤达”的称号,得到乡民的广泛爱戴。

## (二)士绅传统的孕育

士绅传统的孕育与知识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士绅之先驱“士”在一开始并不是被认作为知识阶层,“士”转变为知识阶层,期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sup>[11]</sup>通过学术史梳理,士绅孕育的土壤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指邻近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由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帝国时期。<sup>[12]</sup>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周代的分封制本质上属于封建社会秩序,“封建”不仅是一种政治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基于这一多重结构,形成了统治的贵族阶级和被统治的国人、野人,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周王朝封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依赖宗法的情感;二是依仗周王的实力。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支撑下,周朝前期形成了一个阶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sup>[13]</sup>然而到了西周末叶,贵族经过了好多代,血统关系已远,情感随之脆弱,周王的实力也大不如前,贵族宗法组织开始瓦解。另外,随着生产技术的突破,铁器和牛耕广泛使用,使得农人有能力独立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基层的氏族结构。随之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基础由氏族转为个别家庭,经战国至秦汉,形成了“编户齐民”社会。

随着“封建社会”秩序的瓦解,“贵族政治”旁落,士人阶层兴起。士人阶层的兴起与春秋末年教育的扩大化紧密相关,之前的教育仅限于贵族和国人,随着孔子及门人的自由讲学,学术广泛传播到了民间,拥有知识的士人致力于服务君主,领取俸禄,争取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起初,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世俗人群,并且相当部分来自农民,因此被称之为“有文化

的农民”。<sup>[14]</sup>士人的原初目的在于“出仕”，然而随着士人数量的增加，不能出仕的士人游走于社会之中，成为游士，世家大族们也开始纷纷“养贤”，也即“权贵养客”。权贵养客的目的在于壮大自己的声势，增强实力基础。士人投在权贵门下，更多的在于解决生计，以图获得仕宦的机会。士人阶层的壮大昭示着“贵族政治”的没落，新的政治力量——“士大夫”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秦一统“天下”，对各种旧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革新，中央集权取代宗法制，地缘关系结构限制着血缘关系凝结的权势。当然彼时“贵族政治”也并未在短期内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依然对中央政权构成较大影响。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开启，不仅生发着士阶层人士，而且也消弱着贵族权势。这一演进过程中，知识阶层沉淀了下来，逐渐形成了有稳定来源和制度性保障的士绅群体。与此同时，官府履职形式由“官吏一体”向“官吏分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从正式的“乡官制”过渡为“职役制”，准官员代替了正式官员的部分职权，至宋元时期，乡绅群体逐渐取代豪族大户。

自明至清，随着人口的剧增，并不断迁徙到辽阔的边陲，“官治”不足问题凸显，随之民间宗族、乡贤壮大。乡贤主要承担扶贫济困、化解纠纷和教化乡民等责任，其履职的深入推进将本属于官府料理的部分公务分担起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治不足的困境，也减轻了严刑峻法对基层社会的盘剥，从而节省了国家政权治理的成本。事实上，乡贤首领通常由取得功名的地方士绅担任，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向官僚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同时，出仕的士人也为扩大绅权而奔走相告，成功承接着皇权在地方社会的意志。总而言之，士绅的孕育及士绅制度的传承，一方面，实现着皇权意志在基层社会的运行；另一方面，士绅的履职通常也充分考虑地方利益，从而化解了诸多矛盾纠纷，维系着社会基本面的平稳。

## 二、“国家—社会”互构：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社会”范式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影响深远。总体来说，此范式有三种取向：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国家—社会”互动论。从理论溯源角度来看，霍布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视角奠基了“国家中心论”；洛克、康德的“社会先于国家”“社会外于国家”视角奠基了“社会中心论”<sup>[15]</sup>；社会结构理

论奠基了“国家—社会”互动论。用上述研究取向分析中国传统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大致呈现出“吏民社会”“士绅自治”“官民合作”等关系形态。事实上，基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国传统治理结构有着鲜明的“国家—社会”互构特性。

### (一)“国家—社会”研究范式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该范式侧重于探讨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具体研究中主要关注权利的界定、分化、平衡和规范秩序等社会规则的变化。<sup>[16]</sup>“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有三种理论倾向：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黑格尔的国家优位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前两种理论有着明显的“中心论”取向，即“社会中心论”抑或“国家中心论”。洛克较早提出了“市民社会”思想，认为人类的最初生活是一种自然状态，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大权力。为了克服前国家状态的“失范”弊端，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让渡权力，继而建立国家。由此，国家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是工具性的，即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一个更高的阶段，能够更好体现社会的普遍利益，即国家不仅仅是维系和完善自然状态的工具，更是一种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将这两种范式用于解释中国社会时，存在两种趋向：1.国家对社会的控制；2.社会对国家的渗透和改造<sup>[17]</sup>。呈现出要么强调“一统体制”，要么被迫“地方自治”的两难困境，难于将国家与社会有效沟通起来。

基于“中心论”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现实困境，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旨在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sup>[18]</sup>。“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这种“互动论”转向对探析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给予了有益的启示。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国家主导抑或“社会自保”仅在特殊时期短暂存在过，从长时段来说，国家与社会的互构是常态。郑杭生先生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通常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又包括市场，“国家”则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具有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sup>[19]</sup>

鉴于上述学理分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深化探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过程中，强调中国的

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特定治理中的制度逻辑。与早些年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对立化,片面强调“国家控制/入侵社会”抑或“社会制约/对抗国家”的研究进路不同,也不拘泥于社会结构论的静态型“国家—社会”互动,当前学界逐渐转向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建构、多元主体形塑,以及合作共治等层面的探讨。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政治社会学核心议题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对中国国家治理中社会文化基础的探析。

## (二)治理结构体系中“国家—社会”

传统社会时期的中国曾取得辉煌的政治建设成就,在“天下观”和“大一统”的治理理念,以及“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运行实践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长时期保持着世界的领先地位。<sup>[20]</sup>然而近代已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的治理体系被彻底打破,皇权衰落,“一体化结构”解体,民间权威失去“合法性”依据,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临激烈的西方“冲击”,作为“回应”,晚清民国无数仁人志士掀起了救亡运动,这其中制度革新是重要的探索领域。在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失败后,志士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转而向马克思主义学习,拓展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在经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以及吸取探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后,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探寻“中国之治”的视域里,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制度逻辑无疑是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一制度逻辑由两部分构成,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实上,“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目标和结果。

探析当代中国治理的演进逻辑,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文明治理的“五位一体”格局,这为当代“中国之治”的生发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治理议题悄然发生变化,当前的着力点在于如何较好的激发出各维度的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

与以往的治理体系不同,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强调的是“治理的结构体系”,即党组织、政

府、企业、社团、公民个人、新媒介的“六位一体”。主要解决的是“治理主体是谁”“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两大议题。现代治理体系型塑的基本要求大致可归结为:1.要有多元化、负责任的治理主体;2.要有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多元主体和谐关系。现代治理体系型塑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厘清各自的权限边界,把本应属于市场、社会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和社会处理,政府重点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维护社会规则等职能。

基于上述学理分析,现代治理体系凸显为“治理的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呈现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且二者之间关涉的焦点在于集体认同的内容、社会资源的配置、社会分层的性质等领域。<sup>[21]</sup>将之付诸于特定的实践场域,便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不断塑造和重构。

近年来,国内学界总结提炼了三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即“原生治理”“外生治理”“次生治理”。“原生治理”是一种自发而生的治理模式,典型治理主体为宗族长辈,强调民众利益,然国家缺场。“外生治理”依靠国家正式派驻,典型治理主体为社区“第一书记”,履职效率高,但悬浮于民众之上。士绅传统提供了“次生治理”的复合治理模式,其效用在于:1.治理主体为“体制外人员”,得到国家赋权;2.治理主体内生于治理区域,与域内其他主体存在信息对称;3.治理主体处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旨在兼顾二者的利益实现。<sup>[22]</sup>“次生治理”扎根于民众,切实反映了基层的声音,同时传达了国家制度层面的意志,实现了“国家—社会”的深层次耦合。

## (三)“国家—社会”互构视域下的有效治理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研究范式,“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学理价值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取向。然而该范式毕竟是基于中国以外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现实时,局限性显而易见。因此为了较好地呈现以往探析中所忽略的面向,需要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做出操作化变量调整,这样的“研究模型”的本土化转换,一方面可契合实践基础上“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另一方面也可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社会文化基础。对中国士绅传统作个案研究,恰恰体现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语境中的转换逻辑。具体分析中,以“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为主线,兼顾“传承与展望”的历时性维

度,深入探析中国士绅传统与新社会阶层之间治理效能的承接性。

### 1. 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国家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治理机构,国家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职能方面。国家职能分为外部职能和内部职能,外部职能主要在于防御外部入侵,保卫国家安全,为国内政治管辖和社会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内部职能具体可划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政治职能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职能;社会职能是运用国家权力承担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sup>[23]</sup>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职能不仅体现着国家本质,而且受特定社会文化基础的制约。换言之,国家权力的实现有多种形式。

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是两个较为基础性的概念,权力是指一集团操控并塑造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能力;权威强调的是社团运行的一套制度及制度化的安排。<sup>[24]</sup>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官治”的不完备,国家权力难于直达基层社会,于是采用“权威”发力的策略,加强“合法化能力”来实现统治,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强化认同。具体而言,为了保障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和维持社会基本秩序,政权一方面要渗透介入社会,从而实现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需要向社会提供基本服务。

### 2. 社会自下而上的承接转化

国家权力运行具有强制力的一面,在其具体的推行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缘由,易造成政权与民众的直接“照面”,从而引发冲突。基于这一现实困境,特定社会中“第三领域”的形塑便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领域”属于宏观社会的一部分,介于政权与民众之间,其发展壮大成为“非正式体系”,补充着正式制度的不足。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府威力无边,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古代很长时期内,官府的设置通常也仅仅止于县一级,县下治理则主要由民间社会力量承担。中国士绅传统的形塑,实质上是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缓冲,<sup>[25]</sup>效用在于减少甚或回避了国家与民众的直接“照面”,从而消除了不必要的冲突。士绅治理的设定,使得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呈现出一个“中介”联动的递进模式:政

权—士绅—民众。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士绅扮演的角色既是一种中介,也是一种缓冲。其缓冲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及时承接官府的意志和各种摊派,根据地方实际,商讨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当出现横征暴敛等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情景,便出于维护地方利益,与官府进行谈判交涉。

### 3. 实践基础上“国家—社会”互构

国家与社会本为“一体”,不可分离,现实中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偏重了某一端点。<sup>[26]</sup>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社会无所谓国家,没有国家无所谓社会。即便在西方标榜的“公民社会”中,国家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因此所谓绝对的“国家主导”或者“社会主宰”,其实仅是一种迷思。一个繁盛的国度必然呈现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社会型塑国家的同时,国家也型塑着社会。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否则要么导致“全面专政的社会”,要么导致“全民干政治的社会”,<sup>[27]</sup>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稳定均为不利。

基于以往中国社会研究倾向于“以国家为中心”自上而下分析范式的弊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发现社会”的热潮,然而多年下来,由于有意回避“国家的视角”,导致具体研究走向了碎片化。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存于期间的秩序在缺失国家建设的特定情境中,通常是依赖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sup>[28]</sup>鉴于此,近年来,政治社会学研究倡导“回到国家”。

实际上,国家与社会从来就不是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回溯历史,中国的“国家”“社会”无疑是在紧密缠结和互动中演进,相互塑造出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sup>[29]</sup>基于此,探析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需要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现实中的并存、拉锯,进而洞察二者实践中的相互渗透、相互塑造。

基于上述学理分析,明晰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需要关注两个维度:横向共时性维度上,应当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学术对话,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理念和治理经验;纵向历时性维度上,应当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历史积淀,使之导向现代化。当然这两个维度的探析最终还是要回到当下“中国之治”的火热实践中,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促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进而实现实践基础上“国家—社会”的良性互构。



### 三、中国士绅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范例

在传统中国,民众通常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即所谓“四民社会”。按照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界定,唯有“士”为“治人”阶层,其他的农、工、商皆为“治于人”的阶层。<sup>[30]</sup>这足以窥探到“儒法传统”中士人阶层的显赫社会地位,士人之所以地位显赫,与其所具备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身份,以及根植民间的广大群众基础密切相关。在“国家—社会”互构的视域下,士绅治理的效用在于:第一,传达“国权”意志,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成为“官治”的重要补充;第二,出于“爱乡”情怀,切实维护地方权益,成为乡贤文化的主导力量;第三,士绅治理的制度化,凝结成沟通“国权与基层”“官治与民间”的桥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 (一)士绅治理的制度化

士绅在传统中国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考察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机制,士绅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与其他制度相配套形成基层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机制。<sup>[31]</sup>作为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士绅连接了官府与民间社会,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核心。与此同时,士绅出于维护地方利益,切实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维系了地方公共品供给等的正常运转。

士绅传统是中国宗法社会中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士绅传统付诸国家治理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士绅制度化与绅士身份的建构过程紧密相关,相伴于知识、功名和权力的耦合,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科举制的大力推行,原本作为贵族最底层的“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修养一跃成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士大夫”独立阶层,并在型塑“学而优则仕”的过程中积极争取任职官府或者成为官府的幕僚;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疆域的拓展及郡县制的广泛推行,“官治”能力有限问题凸显,需要谋求民间力量参与国家治理,未出任官职或返回故里的士人及出任官职的亲属等逐渐形成国家与民众之外的“第三领域”,并取得治乡的“绅权”。之后,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完备,士绅治理制度化也渐趋完善。

事实上,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个较为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功名和职衔,凭借所占据的诸多资源优势而拥有社会特权,过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只通过科考未任官职者,也有一定特权,比如免除徭役、免除笞刑和享有俸禄等。<sup>[32]</sup>这些人在宋

代以后逐渐被称之为“乡绅”,明清时成长为“士绅”。

随着明代中后期士绅阶层的渐趋成熟,他们享有的社会特权不断提升,政治上“联系官民”的角色得到强化;经济上享有少纳赋税,免除丁税和各种徭役的权力;文化上依据熟知儒学经典而掌握社会的基本知识体系;教化上通过自身“道德模范”的身份成为教化地方的主导力量等。士绅阶层的特权还体现在身份上的尊贵,这种尊贵通常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犯法也不与民同罪,如必须严惩,也需要免去其士绅身份再行问罪。

总而言之,与欧洲的绅士(gentleman)不同,中国的士绅在科举制实行后有着特定的含义:1.士绅是一种特定的身份地位,主要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sup>[33]</sup>;2.士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有两大群体:士绅和农民,其中士绅分为官吏和地方绅士,士绅是一个比官僚大,比农民小的群体,是官僚的后备人才库,充当着官民之间的中介<sup>[34]</sup>;3.士绅是一个社会知识阶层,他们博学多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特定的文化抱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4.士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士绅们通常会通过学识、联姻等资源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继而社区事务和地方行政产生影响。<sup>[35]</sup>

#### (二)士绅履职旨在“补官治之不足”

在传统社会,朝廷通常采用“行政发包制”的方式实现统治,具体分为体制内“行政内包”和体制外“社会外包”,现实中如何匹配各种发包形式,主要考量的因素有:统治风险、治理成本和预算约束等。<sup>[36]</sup>对国家来说,一方面必须谨慎评估统治风险,另一方面还需要仔细考量预算约束和行政治理成本,在统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国家会尽可能节约政权治理成本和放松预算约束,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为地方建设出钱出力,实现“补官治之不足”的目的。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对于地方精英的政治潜力是心有忌惮的,因而试图掌控地方精英的制度角色。<sup>[37]</sup>这使得士绅阶层必须在对国家权威不造成威胁的前提下,方可展示其治理地方的效能,进而影响国家的治理结构。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上层是官制系统,由皇权控制;基层是地方管制系统,由乡绅控制。具体治理效能的实现是两个体系的结合,即通过科举制度而凝结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统一体系,以及基层社会实际性的分治体系。<sup>[38]</sup>分治体系指的是由分散于基层的多个权



力中心所实施的社会治理,其主要承担者是遍布于乡里的士绅,他们日常生活于自身所属的族群当中,拥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和公共声望,是地方的“头面人物”,参与处理地方公务、承担民间纠纷协调、教化乡间农人,等等。在地方管治系统中,皇权并不企图取代士绅而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往往是通过绅权展示其“权威”,地方绅权则具有实际的管治意义。

对于地方治理的细节,国家也是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这为士绅阶层治理地方给出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士绅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参与地方社会治理;2.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传统中国的地方好似一个自治共同体,地方的公共事务通常由士绅出面协调处理,士绅一般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了乡民的广泛认可,而且还得到了官府的认定。于是,士绅便不仅具备“公众性”,并且还扮演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代表,从而成为地方的主要治理阶层,维系着基层社会的日常秩序。事实上,士绅不一定富有,但通常出自殷实家庭。正是基于家庭背景和个人才干,士绅具备了威信,能服人,在地方农田、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方面有话语权,且颇具号召力,通过自身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本和人脉关系,切实引导地方经济发展。

作为传统社会的有闲阶层,相对富足的经济条件保障了士绅能够饱读儒学经典,认同礼制“文明”观念和规则,有效推动着乡民的道德教化。士绅自发或授权于官府,从而出面组织和协调地方公共事务,实质上发挥了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一方民众的道德楷模,士绅又对乡民的品德培育起着垂范作用。

### (三)作为官民“中介”的士绅阶层

在“国家—社会”互构的关系场域中,士绅被视为国家政权和民间社会的“缓冲区”“第三领域”,起着上传下达政令,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sup>[39]</sup>。由此,士绅便扮演起双重角色,既是官僚体系的代理人,又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官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士绅一方面替官府征收赋税,并积极争取为民众减轻一些苛政;另一方面竭力维护地方惯习和权力,又频频充当官方威权的实施先锋。

基于长时段的宏观视域,士绅阶层为传统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部分智囊、领袖人物和组织功能。<sup>[40]</sup>士绅是中国“大一统”皇权制度确立的基础上生发的独

特社会阶层,士绅的沉浮深受国家结构、制度因素的影响,他们身居乡里,随着其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成为事实上的地方精英,承担着国家与地方社会政治衔接的桥梁。具体而言,士绅由政府旌表授权,自上而下承担着许多地方的管理协调,在官府面前,自下而上的又代表了乡民的利益诉求。

士绅阶层之所以被赋予上述诸多特权,其主要缘由在于维护传统礼治的需要,体现了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策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央权力执行面临的困境是:第一,基层社会难以控制,若控制不当,易引发深层次危机;第二,中央权力总试图对基层社会进行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汲取资源。这一矛盾的破解通常需要士绅阶层的协调,一方面对国家负责,教化百姓;另一方面,对百姓负责,限制苛政对乡民的侵扰。<sup>[41]</sup>总而言之,在长时段“王权主义”的权威框架下,士绅阶层构筑起互嵌型“官民共治”的独特治理形态。

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群体,这一阶层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传统皇权统治下,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协调平稳,有效维护中央“一统”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中一个典型特征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这促成了“双规政治”,即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族权),两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在县下自治体系中,士绅阶层充当着官民之间的“中介”,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鉴于此,可以说士绅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中介,士绅阶层具备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平衡着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利益。一方面,士绅依照国家的政策,协调管理本地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他们在地方上又代表着平民百姓,向国家官僚机构表达意见。<sup>[42]</sup>在“补官治之不足”与“补民治之不足”之间充当着“平衡器”的角色。

### 四、近代士绅的转型与新社会阶层

历史进入到近代,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挑战,中国文化传统不断被侵蚀,导致了民主革命浪潮的此起彼伏,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恢复传统秩序,而是确立一种对丧失东西的补偿意识。<sup>[43]</sup>在西方冲击和民主革命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叠加下,中国社会变革中孕育着强大的政治变革,最终影响到士大夫传统。之后,在“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衍生出“人民的文化”,消解着晚清民国时期士绅裂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土豪劣绅”现象。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

趋向的转型发展中,新社会阶层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进而深刻影响到当前国内的社会阶层结构。

### (一)士绅阶层的衰落及转型

近代已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体制步入崩溃,晚清民国政府和各地军阀为了实现收税、征兵等目的,逐渐推动政治权利深入基层。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士阶层的社会来源被瓦解,绅权的社会基础随之摧毁,士绅的裂变成为传统社会迈入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 1.“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

历史进入近代,“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致使中国传统社会步入瓦解,天朝帝国体制几近崩溃。当时中国人感受到的挫败与沮丧,决定了中国的公私行为,有百年之久。<sup>[47]</sup>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西化”似乎成为一条可选择的路径,然而接连的“西化”探索挫败,致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的。

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期的现代化探索也是出于对西方冲击的种种回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乡村社会渐趋衰败,缙绅城市化成为全国性潮流,由此原有的官僚、乡绅、宗族相互耦合的格局得以打破,士人活动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sup>[48]</sup>士绅城市化后与官僚机构相对抗,成为瓦解旧体制最重要的社会势力。<sup>[49]</sup>随之,地方势力合法化,并在体制内与中央王权抗争,使得专制王朝土崩瓦解。

事实上,士绅阶层的城市化和民间社会的衰落是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形态断裂的明证。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发生明显分化,其身份地位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特别是士绅阶层发生重大变化。

#### 2.士绅阶层的转型

在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中,地方管治权通常由士绅阶层掌管,只要地方能彰显好皇权的象征意义(意识形态),国家一般不会谋求地方的管治权。对于地方治理的细节,官府也是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这一运行千百年的治理模式在近代发生急速转变,其主要缘由是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几近崩溃,局部战乱不断,致使各地不断扩大征兵、设法增加赋税,等等,这一切促使国家政权对基层资源的动员及组织建制增强,地方治理逐渐被纳入官治范围。

随着晚清以来基层政权建设的深入,地方权威转变为政府设在地方的管制政权的分支,其职能凸显为征兵、收税、进赋,以及维持治安等,这一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过程,瓦解了原有治理体系的基础。特别是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切断了中央权威与地方精英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sup>[47]</sup>与此同时,城市化、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西式教育的确立等等,使得“士”的社会来源被瓦解,绅权最重要的基础被摧毁。大部分士绅离开乡村进入到城市,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成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演化为近代的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sup>[48]</sup>。这一进程中,原有的士绅阶层和官僚体系失去了政治优势地位,“富有”逐渐取代“有学问”,成为人们获得精英身份的途径,士绅的目标转向了“商绅”。

#### 3.打倒“传统”视域下的“土豪劣绅”

清末民初,国家政权建设不断深入基层,“政权内卷化”造成的恶性循环是,国家各种赋税的增加致使“营利型经纪”增生,“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反过来又催生着更多的捐税。<sup>[49]</sup>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传统基层社会的民间领袖不断被“营利型经纪”所替代,其中不乏“无赖”“土豪”“恶霸”。

此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不再把读书入仕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而是加入到城市化的职业流动中。举凡公司、工厂、报馆、学会,乃至留学、教书、新军等都成为他们的理想之所。<sup>[50]</sup>随着士绅群体的分化,特别是士绅人士举家搬迁城市生活之后,一个专门负责收租的“中介”组织诞生了。这些“中介”组织的人群通常由乡里的大家族成员、有能量者甚至地痞流氓等来充当,他们一则没有士绅的德性,二则也只是从收取的地租中提取一定的提成。因此“收租中介”一心想着就是按时收取足额地租,这在灾荒年或个体农户有困难时,往往呈现出横征暴敛的“土豪劣绅”形象。

近代士绅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土豪劣绅”现象之所以产生,另外一个主要的缘由是晚清民国时期农民经济负担的加重。传统社会的农民大致有两份收入:一份是耕种的收成,另一份是农闲季节从事的手工副业收成。在平常年份,有了这两份收入来源,一般农户在交租、交税之后,可以有个过得去的生活。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加剧,洋布等日用工业品大量涌入,农民原先的手工副业由于相对的“高成本”,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这直接导致农民的收入减半,再

加之灾荒年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多,广大农民家庭经济负担持续加重,濒临破产的边缘。在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叠加下,关涉到地租收取,近代士绅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便大致沦落为“土豪劣绅”。

### (二)新社会阶层的涌现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通常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打倒土豪劣绅、社会主义改造、计划体制等因素的共同叠加下,国内逐渐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总体性社会”中,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民众”两层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趋向的转型发展的不断深入,国内所有制形式、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和治理方式等领域发生着巨变,随之大量新社会阶层涌现。新社会阶层的快速发展,壮大着社会中间层,国内社会由之前的“国家—民众”两层结构逐渐转向“国家—民间社会—民众”三层结构。<sup>[51]</sup>反过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拓展着新的治理空间,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开启丰富着基础元素。

从“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来看,中国的改革可以被看作国家对“社会”的“分权让利”过程,或者说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关系的调整和松动过程<sup>[52]</sup>。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外”人员流动加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新社会群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sup>[53]</sup>从学理角度探究,新社会群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层,然而新社会群体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特征,比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大致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市场能力突出、职业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和总体素质较高等。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不仅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更趋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趋向“橄榄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在此进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分化,呈现出诸如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快速成长的主要缘由在于:1. 面向市场取向的转型发展,促使经济社会提速变革,个体价值实现多元化;2. 有志于创业的“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3. 有志于创新者,成为新兴行业的开拓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

组织中,以中青年为主。<sup>[54]</sup>事实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和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及技能,他们当中有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技术创新工作,有的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担当重任,既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sup>[55]</sup>

事实上,与其他阶层相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主观认同明显倾向于社会“中间阶层”,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sup>[56]</sup>鉴于此,国家应当适时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切实畅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其在反映利益诉求、社会公益活动和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的优势效用,进而为深入推进“中国之治”注入新的动能。

### (三)新乡贤的形塑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有鲜明的“本土化”特性,纵观中国历史的“万古江河”,三皇五帝时期有“贤能政治”,夏商周时期逐渐形成了“贵族政治”,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局面的逐渐形成,“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贵族阶层走向衰落,士大夫官僚阶层兴起。之后,隋唐时期科考的开启,“学而优则仕”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风尚,成就了知识分子进入士绅阶层的“正途”。宋元时期,乡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纳捐获得“士绅”身份的“异途”规模扩大。明清时期,中国士绅传统达到了鼎盛,“士绅”包括“士人”和“乡绅”,主要指在野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囊括了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

事实上,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拥有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士绅的治理效能,费孝通提出了“双规制”,即“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其基本治理模式是“国家(皇权)—士绅—民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的变革促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其中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成为重要一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县下设立乡镇(街道),乡镇下设村级(社区)。特殊年代,村一级也属于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一竿子”直插基层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总体呈现出“国家—民众”两层结构,即民众直接面对政权,这通常造成“统的太死”,使社会失去活力,难以激发出应有的创新力。

改革开放的开启,在基层实行“乡政村自”,即在

乡镇(街道)实行国家政权组织建设,村(社区)实行村民(居民)自治。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团组织形式等的变革,突破了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制度障碍,各类新社会阶层涌现。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形塑出一个新的中间力量,缓冲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中间阶层”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效用在于,一方面,导入现代产业化元素,引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文化事业,促成地方“善治”的实现。事实上,近年来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中,悄然传承了中华士绅传统,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乡贤”文化。

当前国内各地依据“人才振兴”,出于“地方性知识”的探索,形塑出了诸多形态的“新乡贤”。“新乡贤”虽形态各异,却具备一些共性的特质,即德才兼备、爱乡情怀、参与法治、协同共治等。鉴于此,可以说“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代缙绅的传统,又具备新时代的涵养,大致包括一些在外为官而返乡服务、在外为教而回归故里、在外创业而反哺乡间,以及长期扎根乡村而以自身才干推动家乡发展的人士。基于新乡贤人士致力地方建设的逻辑,可明晰,“新乡贤”是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交融中应运而生,现实当中通过与基层组织的合作及补位,创新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和实践模式,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方社会因“精英人才”流失而造成的治理空心化困境。

### 五、结论与讨论:中国士绅传统的传承与展望

在西方政治社会学“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视域中,国家与社会有各自“权力”覆盖的领域。然而,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较高的自治特性。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政权组织形式较为分散,基层国家政权组织机构通常设置在城郭,对于管辖地所属众多乡民很难履行行政管理和司法规范,这客观上造成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脱节。这一现象,费孝通先生将之概括为“双轨政治”,<sup>[57]</sup>即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具体而言,县以上的政权由正式的官僚机构负责运转,县以下则奉行无为而治、政权悬空,由乡绅出面实现社会整合。在“双轨政治”中,士绅处于关键位置,秦晖强调道,“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sup>[58]</sup>士绅虽身在民间,却行使着“统治”职能,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统治精英”。士绅行使地方治理职能所依赖的主要资源是由自身威望、知识、财富和能力等资本所衍生出的非

正式影响力,一方面,承接转换着皇权的意志;另一方面,教化乡里,维护着地方社会的利益。居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成为二者的中介和纽带。

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的特殊阶层,他们不仅拥有官府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而且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士绅制度付诸实施,成为基层社会得以稳定运转的重要机制,向上体现着“皇权”的道统地位,维护着“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向下履行着“化民成俗”的基本职责,彰显着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魅力。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社会大致可划分为“三层结构”,即国家(皇权)、中间层(士绅)与底层民众。士绅是伴随科举制度而生发的民间精英阶层,在宋代时,随着科举制的深入推进,士绅阶层趋于成熟,到明清时,士绅的数量和能量均获得极大发展。进入到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清末“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被迫步入蜕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原本作为社会中间层中坚力量的士绅发生了裂变,基层社会被侵蚀的状况愈演愈烈。1949年前,由于时局动荡,社会中间层虽然力量微弱,但以士绅为主体转型形成的知识精英、工商业者、新式军人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着一定的“中间”作用,承担着筹募善款、赈灾救助等诸多公益活动,一些进步人士更是成为民主革命的先声。1949年后,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趋于消失,最终形成了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的“两层社会结构”,这种国家与民众“面对面”的互动,成为国家与民众可能直接冲突的条件。<sup>[59]</sup>1978年以来,基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急速转型发展,大量新社会阶层涌现,时下对这一社会阶层人士虽给不出一个确切的定位,然而其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事实无疑是传承了士绅传统的优良因子。

从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来讲,社会分层的理想形态为“橄榄型”,“橄榄型”社会的形塑需要促进中间阶层壮大。<sup>[60]</sup>当前,学界对国内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关注两大人群:一大人群是“中产阶级”;另一个是“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主要指的是城市的“白领”,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等;中等收入人群主要是指出自乡村的个体创业者或进城务工的“蓝领”,两者的共同点是收入上属于中高水平。对于壮大中间阶层这一议题而言,当下的状况是,一方面,认知层面对“中间阶

层”的具体指涉不清,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间阶层,即便被认定的中间阶层各构成部分也是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实践层面受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构成中间阶层的各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虽然过去一段时间就促进国内中间阶层发展而言,的确困难重重,然而进入新时代,中国中间阶层发展必将提速。<sup>[61]</sup>

总而言之,士绅是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士绅治理是中国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在世界治国思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更要汲取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优良传统。缘由在于,国外理论只是“流”,中国传统才是“源”。只有扎根中国文化之源,方能探索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实现“中国之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sup>[62]</sup>事实上,作为“中国之治”柔性结构的士绅传统既是对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现实运用,又是近代以来探寻“中国之治”历史经验的成果凝结。<sup>[63]</sup>基于此,应当说到了全面检视“中国社会问题在中国,中国研究却在美国”窘况的时候了,柯文将“中国中心观”的取向概括为四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把中国社会从“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积极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的撰写。<sup>[64]</sup>鉴于上述,深入挖掘士绅传统中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势必能为当前“中国之治”的深入推进提供智力支撑。

### 参考文献

- [1]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0.
- [2]吴铮强.士绅阶层前传:两宋的游民与土豪、科举与理学【M】.上海:中西书局,2021:1.
- [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6.
- [4]费孝通.中国士绅【M】.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5.
- [5]应星.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2(03):97-111.
- [6]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6.
- [7]Tung-tsu Chn.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169-172.
- [8]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
- [9]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增订本)【M】.上海:中西书局,2021:17-18.
- [10]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M】.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382.
-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
- [12]费孝通.中国士绅【M】.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5.
- [13]梁庚尧.中国社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20-21.
- [14]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268.
- [1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190.
- [16]何宏光,王培刚.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J】.中国研究,2007(Z1):29-56.
- [17]应星.中国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
- [18]李姿姿.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J】.学术界,2008(01):270-277.
- [19]郑杭生,杨敏.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J】.南京社会科学,2010(01):62-67.
- [20]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
- [21][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M】.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29.
- [22]王杨.传统士绅与次生治理:旧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新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20(02):83-89.
- [23]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88-189.
- [24][美]安东尼·M.奥勒姆,约翰·G.戴尔.政治社会学(第五版)【M】.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
- [25]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1992(04):58-64.
- [26]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J】.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10.
- [27]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28-29.

- [28]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2.
- [29]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92.
- [30]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36.
- [31]龙登高,王明,陈月圆.传统士绅与基层公共品供给机制[J].经济学报,2022(02):344-362.
- [32]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50-254.
- [33]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
- [3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
- [35]陈新专.明代士绅培育个体品德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0.
- [36]周黎安.“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J].社会,2022(05):1-36.
- [37]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6.
- [38]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0.
- [39]马良灿,黄玮攀.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的双重变奏[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49-57.
- [40]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9.
- [41]杨建荣.中国传统乡村中的士绅与士绅理论[J].探索与争鸣,2008(05):44-47.
- [42]杨小辉.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J].学术界,2007(06):228-232.
- [43][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M].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44]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513.
- [45]秦子忠.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嬗变——“差序格局”的再考察[J].兰州学刊,2023(09):19-28.
- [46]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5.
- [47]Dominic Sachsenmaier, Jens Riedel, Shmuel N. Eisenstadt.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M]. Leiden/Boston: Brill, 2002:158.
- [48][美]易劳逸.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M].苑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391.
- [49]Prasenjit Du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251.
- [50]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1.
- [51]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01):37-54.
- [52]张静.中国社会学四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24.
- [53]李培林.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5):55-61.
- [54]李强.社会学视角中的新社会阶层[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4):51-57.
- [55]张卫.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必然、应然与实然[J].江海学刊,2022(01):125-133.
- [56]张海东.中国新社会阶层——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64.
- [57]费孝通.中国士绅[M].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59.
- [58]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2.
- [59]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2.
- [60]张海东.理解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9.
- [61]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534.
- [62]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61.
- [63]冯笑.“中国之治”的柔性结构及其优势机理[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2(03):36-45.
- [64]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186.

责任编辑:闫丽红

# 始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刘良军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基础性的战略任务。毋庸置疑,就前段时间的主题教育而言,党员干部学思想热情高涨,普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得看到,学思想不能仅仅停留于是什么,必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同时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也只有善于运用,才能进一步彰显真理的魅力、实践的伟力,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有新作为、新气象。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换言之,党员干部既要深刻体悟学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更要一如既往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方面着力,确保在行动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一、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创新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吃着甘蔗上楼梯”,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与日俱增,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塑造力之所以显著提升,至为根本的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以科学理论作指导,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赢得历史胜利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以之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才能顺利推进

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一新征程上党的中心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我们始终在风云激荡的世界上站稳脚跟、保持定力、增强自信厚植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彼此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契合所以结合,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鲜明呈现。事实也是如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追根溯源源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任何时候都张弛有度、应对得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

## 二、切实把看家本领学到手、学到位

带着感情学思想。要做到身入更需心入,毋庸置疑,这里的“心入”即强调学思想必须带着感情、饱含深情、善于共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于纵深推进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中所创立的,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诚之心、赤热之情。情到深处自然浓。由此党员干部只有带着感情学思想,才能不待扬鞭自奋蹄,切实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学到位。

刻骨铭心学思想。无论是“十个明确”“十四个坚

作者简介:刘良军,男,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持”,还是“十三个方面的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如果只是满足于知道了,必然少知而迷,不知而惘,无知而乱。因此只有边学边思,把是什么搞清楚的同时,也深入思考为什么,才能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最终入木三分、刻骨铭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发表这一重要论述、作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前因后果弄明白,方能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思想的精髓、论断的奥妙,避免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唯有刻骨铭心学思想,才能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思想升华、灵魂洗礼。

融会贯通学思想。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完全可以说,无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无不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党员干部学思想必须善于相互联通、勤于融会贯通,既以理论观照现实,又从现实变化变迁中深刻感悟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实践证明,融会贯通学思想,既有利于认识深化,也促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化,更为接下来转化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行动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在运用思想、践行思想

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没有理想信念,抑或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在精神上缺“钙”、精神上得“软骨病”;另一方面,要志在四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党中央必须有权威。因此党员干部要在学深悟透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永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要深刻认识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必须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不叛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长期执政的最稳固基石、最强大底气。因此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爱民恤民惠民的智慧和营养,视让人民生活幸福为“国之大事”,努力把最广大人民的

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造福群众作为最大的政绩,持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让亿万群众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党的领导下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求真务实,不断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创实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光辉典范。由此党员干部运用思想、践行思想,必须树立实干导向,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必须弘扬“四下基层”精神,主动走到基层一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战天斗地、攻坚克难。唯有崇尚实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

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营造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被誉为“人民群众的福星,腐败分子的克星”,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正气和锐气勇于向不正之风亮剑、向腐败行为宣战。敢于斗争才能打开新局面,善于斗争才能营造新风尚。一方面,党员干部应勇于同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做斗争,坚决不当“绅士”,不做“老好人”;另一方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党员干部必须洁身自好,勇于自我革命,敢于跟自己“过不去”,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共同推动党基业长青、青春常在、活力永现。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学思想永远在路上。古语云,得其法者事半功倍,只有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才能既把思想学深悟透,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有效应用、做到管用。更进一步言,党员干部坚持学思想是本职本分,要确保党的理论每创新、推进一步,就第一时间吸收消化、把握要义、武装头脑,并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规范言行,始终如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方能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于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责任编辑:李霞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统一战线政治优势与运作逻辑

闫脑吾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政治策略和表现,是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产物。事实证明在伴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百年过程中统一战线形成了自身政治文化和逻辑,并不断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发挥着基于这种逻辑的效能和优势。挖掘和阐释其中深刻学理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这一过程的科学性所在,也是挖掘和理解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优势及策略并进行相关对策的思考,既是学理理性的使命也是统一战线的责任使然。

**【关键词】**统一战线 政治优势 运作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针对西方式现代化总结提出的既有事实逻辑又有话语建构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并反思西方现代化教训而形成的现代文明成果的现代化,主要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就面向的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现代行政、社会、市场的现代化,是中国国家能力的直接体现与结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时期经验总结的有力武器和法宝,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和实践效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挖掘和理解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优势及策略并进行相关对策的思考既是学理理性的使命也是统一战线的责任使然。

## 一、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禀赋

### (一)统一战线是一种政治文化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借鉴马克思统一战线的

理论与实践并吸收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和丰富政治资源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1]</sup>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式开辟了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中国儒家文化提倡和合等思想是统一战线传统的文化和思想渊源,如《礼记·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进程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统一战线不仅以一种法宝作用在使用,并且生成了一种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精神内涵和价值依存。而正是这种形成的文化所具有自身内部和向外的凝聚力功能,由此促进了社会共识、社会认同和社会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国家的征程,生发出了无限的政治生机与动能。文化在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其内涵的抽象性和外延表现的广博性,中外对于文化的概念有近160多个定

**基金项目:**2023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21届政党年会参会主旨发言论文;2023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藏传佛教中国理论与实践”(ZK20220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脑吾,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智库课题评审专家,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

义。马克思将文化予以至高的实践性的功能性地位。认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sup>[2]</sup>。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指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注重循序渐进变易、生成的功能与过程。统一战线形成一种文化是由于其作为一种形态形成的政治制度、思想、过程、习惯、记忆等一系列具有人类文化的特征。政党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基于这些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策略与阶级属性。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活学活用的政治法宝,其文化表现本质属性既具有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明显特征也具有中国文化的气派和风格。

统一战线是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显著特色的政治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工作的结构和策略设置的具体表现。今天提倡的大统战格局是对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作用的历史认可、继承与内容升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政治传统的主要政治产物,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全过程。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维度,这是由历史,经济、民俗等所决定,尤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政治的“集体记忆”。统一战线作为政治文化策略,是今天中国稳定、高效的政府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统一战线作为政治文化策略,是不断促进民意或民心的主要法宝。长期过程形成一种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从而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初心等理念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发挥着历久弥新的政治作用。

## (二)统一战线的社会治理品质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less government and more governance)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sup>[3]</sup>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确立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并将成为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

鼓励建立“法治、德治和自治”有机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些纲领性思想显然具有广义治理内涵的考量与关注,使治理从形式到内容都涵盖现代社会实现善治和突出现代社会在管理和控制上的多元性、互动性和动态性特点。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社会管理进行自我调整,是基于对政党、国家、社会职能和范畴更为科学和精确的认识。强调现代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统治,即它不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权力,而要更多地容纳和依靠非政府主体的自治行动。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需要社会治理体系的确立和健全。因此,不论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内含含有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只是强调的主体和方式不同。统一战线历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后,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应该成为统一战线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顺应经济社会领域变革的时代要求、彰显法宝作用的创新实践。

根据俞可平老师对治理的论述认为治理较传统管理具有以下特征: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协商性;权威来源法律和非国家强制契约的双重参照;治理权力纵向垂直和横向平行;治理范围以公共领域为边界。根据以上特征,统一战线内涵和运作过程符合现代治理政治价值和方法过程的精神气质,统一战线作为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等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与协调。确定的五大板块和十二个阶层的对象,是多元主体类型和范畴性划分的精细化和具体化;统一战线凝聚共识过程的协商性,通过民主协商的功能,为各方面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和政府了解各方面利益诉求提供有效途径,是政策下达和民情上传的重要中介;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是对法理和传统权威的双重整合,因此既可以凭着现代法治理性来进行运作,也可以包容传统文化和权威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进行社会整合;统一战线嵌入的纵向垂直和横向平衡,通过科层制具有的纵向和横向平衡将党和国家治理理念贯穿其中;统一战线工作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在运作过程中主要执行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目标,因此国家政策和目标的公共政策属性和边界就是统一战线的边界。由此可以看出统一战线表现出与现代治理体系在理念和目标

乃至具体内容上的契合。除此现代治理和统一战线政治过程都遵循法治基础,法治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理性之治。法治在哈耶克来看是因为人类无法减少的无知,<sup>[4]</sup>其差异主要在于治理是一种公共制度,而统一战线则是一种政党政治策略和政治文化。不仅如此统一战线是现代治理这一政治进程的有益补充,一是为统一战线社会治理提供执行主体动力,统一战线沟通联系、职能设置以及垂直的科层结构使整合社会多元的力量在执行主体性上具有保障性和稳定性。二是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提供原则参照。统一战线以平等、民主、包容的态度对待差异原则,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融洽汇通的作用。使政府、公众、社会组织和联盟者的资源、政治影响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同合作,从而推动着共同目标的实现。三是统战工作面向个体做工作的策略为现代治理充实人心资源。灵活性、人性化的艺术和策略,在方法上充分体现亲和力和人情味,多做帮助人的实在事,使社会各方面形成国家发展目标、机制、政策的理解从而真心认同,有助于为社会治理获取民意和人心资源。四是统一战线具有中介功能为现代治理提供了连接平台。统一战线具有连接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府、国家与社会、社会与市场的多重中介功能,因此为凝聚共识、整合社会价值认同、为社会治理凝聚重要力量搭建中介功能。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sup>[5]</sup>因此统一战线在目标手段上具有现代治理激活多元力量参与的基本品质与需求。

### (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由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二者为人的理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韦伯的理论反映了这种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也就是说,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

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因此持工具理性的人,不是看重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更确切地说,所选的手段是否是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

长期以来统一战线被许多人定位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忽视了统一战线本身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深刻价值目标。有的同志认为“做统战工作出不了大成绩,不做统战工作出不了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这是对统一战线认为只是工具性的现实表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价值既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政党和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目标,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不是从统一战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其客体的中国人民相分离的主客体,而是如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范畴。共同价值的同质性以中华民族命运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向何处去、有何终极意义等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成为重心所在。首先统一战线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主体上的一致性则决定了其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初心这一价值理性上的同质性。其次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中国国家与统一战线对象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民至上的追求与民族复兴这一“道”上高度一致。第三统一战线是其自身的价值理性和目标,有其基于策略和科层结构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元素。如达到争取人心和共识的公约数这些价值目的。而统一战线作为器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策略和手段。需要利用自身的法宝优势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不断致力于协调五大关系,整合十二个统战对象,通过广泛的沟通协商与说理,不断深刻钻研、宣传以及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始终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全局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审视历史文化逻辑和政治现实处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sup>[6]</sup>我国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包括民族宗教、阶层分化、地域差距等造成的价值分殊化等,都需要以整体视角加以评判和解决。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

为方式、利益诉求等更加多元,特别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具体利益日益多样。”<sup>[7]</sup>这就需要一种跨地域、跨多元文化的且以现代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视觉予以审视。今天以资本、信息的垄断和占领制高点的世界性竞争中,只有整合56个民族、地域性、团体性以及个体公民的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在现代化中与世界其他民族进行博弈。

### (三)科层制优势及其超越

一个有条理的、组织合理的社会结构、涉及明确定义的活动模式:在此模式中,理想地说,每一行动系列都与这一组织的目标在功能上相关。科层制的现代行政体制具有着政治整合和行政管理结构性力量,没有高效、务实、科学的行政科层设置就无法以现代行政的力量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也就失去了国家现代性的基本组织架构。科层官僚制是那些任命的官员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庞大组织的统称。在理想状态下,它遵循规则与程序,有一条清晰的管理链条或权威等级。它使政府的运作具备理性、统一、可预测性和监测性。<sup>[8]</sup>几乎所有的大型组织都具备官僚科层制的特征。因为科层制最大的优势就是遵循层级、沟通与连接的制度化。而制度是规则,或是重复的行为模式,比任何掌柜机构的个人,都要活得长久。<sup>[9]</sup>

科层制一些特征可以在传统中国找到。中国传统社会族群、宗教、以及特殊的民族范畴,都是以家庭、血缘、宗族、地缘等为纽带建立,具有原生性和情感化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流行社会上浓厚的地方性文化习惯。中国的现代化中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并存,一直到今日。<sup>[10]</sup>现代国家是基于科层官僚、法律制度和社会分工人构建起来的复杂政治组织,其精神气质和运作机制是高度理性化的。“通过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sup>[11]</sup>现代科层制在取代传统管理模式,建立将地方和中央进行连接的隶属关系中具有重要角色,体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而科层制本身具有先天的缺陷,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非人格化、技术性、机械性以及对人自身价值的排斥和忽视,其过度注重技术本身而忽视人本身在此过程中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他认为虽然有很多缺陷我们却没办法避免使用它。统一

战线作为早期一种政治策略,在保持其策略有效性和稳定性衍生出相对的科层制。这种科层制是一种策略性持久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一种稳定的人员组织专门化、稳定性实施,导向一种从上到下的科层制设置。设立具有科层性质的统战部门是将策略问题转化成管理过程的知识分子的科层化,<sup>[12]</sup>统一战线虽然在组织上也具有科层制的一些特征,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以人民主体为优先位置,涵盖内容丰富的党外民主人士等十二类统战对象都是人民的类型化和范畴化。处处讲交朋友、人情化、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及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等方式恰恰弥补科层制中只见制度和层级而不见人的困境。尤其现代治理既需要国家、政党顶层设计式的治理规划,也需要发挥每个团体及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理性精神主动参与到具体的行动中。而后者需要通过促成共识,获得社会发展的核心人心资源,对此统一战线既需要科层制的执行也需要灵活的人心工作来达至效果最大化。统一战线说理和人心工作的优势,正是通过知识说理的共识才使成员产生共识认同。因此更具灵活性、人格化方法的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共识和责任感不可或缺的柔性建构力量。

### (四)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责任政治的优势

几乎所有的社会,都通过政党将民众和政府联系起来。政党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以整合政治体制、组织政府并使其保持运转。资产阶级政党尤其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党成员数量在下降、在国家事务上不会取得一致、依赖大量资金等情况说明,政党在特定利益的影响下衰落。<sup>[13]</sup>资产阶级政党是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的功能性产生,资产阶级政党深刻的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是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社会事实的诠释,因此财团等左右政党选举乃至某些总统为了选举发动战争都是常见的事务。马克思极其深刻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sup>[14]</sup>著名马克思学者卢卡奇提出“物化现象”,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如何造成文化方面的破坏作用,他主张共产主义政党能终结造成物化以及被物化的状态。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基于“资本对人的异化”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秉承这一精神气质,建立了人具有至高主体地位的政治结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已经使人

的意义和主体突显,而对资本异化保持谨慎与距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大量的、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度高的成员,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法宝的统一战线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政治化解在具体行动者,致力于争取人心工作。实践表明统一战线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政治化解在具体行动者,致力于争取人心工作,从而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初心等理念被统战对象所理解。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标志。非洲多党的经验表明多个政党会引发混乱和暴力,因为这些政党源于部族的划分。不稳定的政党制度能够破坏一个很好的政治制度。而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作为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为一个民族承担中流砥柱的责任性的最大表现,而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正是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所展开。

## 二、统一战线运作逻辑

### (一)共识传播与引导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是一个由社会、市场、政党等多元政治构件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实体,因此围绕着价值、利益等内容形成一个国家内部非同质性的诉求格局。为了塑造国家核心凝聚力和社会的统一,需要基本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价值、目的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共识。这就让共识成为政治运作获取社会认可和支持达至政治目标的极其重要的目标。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认为:“共识通常被视为政治的真正要义。因为政治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解决冲突的非暴力方式。”<sup>[15]</sup>共识在维系国家政治共同体发展和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治稳定是维系社会发展公共秩序的具体表现,很大程度上是秩序背后政治共识获得建构的主要结果。政治共识既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协商的产物,也与意识形态偏好乃至一定程度的基本政治建构如对合法性权力的垄断等诸多因素有关,由此不可避免地踏入了政治参与的领域。人们对公共事务进行观点和意见的沟通、选举、投票、利益表达等都是政治参与的不同形式而

已。亨廷顿所说:“社会的统一建立在对政治观念的共识基础之上;而只有达成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政治上积极行动的社会公民的确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的社会安排培育并鼓励他们追求这些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sup>[16]</sup>但即便是最主观的认同建构依然逃脱不了文化和结构的枷锁,因此政党、国家的在场及社会制约影响着人的认同和共识。首先群体之间是否形成共识,往往与共识内容满足自己群体或者是个人利益多少和好坏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承认人对利益的基本需要“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17]</sup>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其次共识往往与某个阶层、团体等的归属及由此关联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作为思想性的意识形态成为形成政治共识资源而给予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如桑德斯的研究发现社会运动通常建立在那些关注同一核心议题或具有类似意识形态偏好的群体组织基础之上。第三一定合法性暴力震慑也是形成共识的因素,这一力量基本上是从古到今国家的必要条件。经典的政治学认为政治就是为了解决单纯的暴力。人类对暴毙的害怕强于获利的欲望,由此激发在行动上的深远变化。<sup>[18]</sup>共识程度高其政府作为维持国家内部持续共识的唯一核心会受到冲击。但是,即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代表者,仍然是政治活动的核心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以创新制度、创造途径来维持一定水平的连续性的政治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相较于维系一个共同体的纷繁的制度和规则,更重要的是共同体成员制定那些制度规则所依据的政治共识。正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那些能够预期共同体成员和公共机构行为的规则和一系列公共政策能够制定并富有效率地执行。才能够制定出来。在去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正如施特劳斯常说“意见是社会的要素”某些关于是非、正义、社会如何统治等特别的人类经验,即“自然正当”的哲学传统。<sup>[19]</sup>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

谈判,就有了建立于维系秩序和沟通的共识。而政治关注的另一个指数民意与共识在内涵外延上既有区别又有相同点,共同构成了关于政治支持程度与态度并关系政治效能的常数。在欧尔波看来,民意不是“共识”,民意不仅包括共识,还包括分歧,以及不同意见在“人数、强度和稳定性方面”的“比率”。一定范围的民意不一定是共识,但共识一定是民意。欧尔波认为,民意的客体“特定状况、人、计划”应该具有“普遍重要性”,并强调民意表现为“人数、强度和稳定性的比率”。“普遍重要性”排除了那些不具有这一特征的议题成为民意客体的可能;民意“人数、强度和稳定性的比率”则说明了共识的范围、强度、持续性的状态,由于民意具有偏好与强度的面向,且不完全是理性的,人往往依据具体情景性而作出判断如依情感或狭隘的私利对事情作判断,这些想法就不一定理性,不甚理性的私见汇聚而成的民意于是就有可能未必完全理性,全面的,民意有可能也是对信息了解不足或不对称情况下形成的意见。由于忙于本身的事务,对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的看法会建立在有限的知识基础上。稳定的:因为表达民意载体的议题的认知程度的不同而有易变或稳定,当民众对于自己认知程度高的议题或问题的看法不易改变,而对于较陌生的议题则容易受外界干扰和影响。显性的,政治学者指出民意有两个面向,偏好(preference)与强度(intensity)。

### (二)双重的社会嵌入

正如经济“嵌入”在社会生活其他制度当中一样,政治也是如此。统一战线的吸纳往往和嵌入互为因果二元一体,从策略方法到机构的嵌入,都与整个吸纳过程互动与补充。这种过程伴随着政党、社会、国家、民众之间复杂而广泛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形成过程。因为国家能力是一个互动过程,是管理国家、大众和官僚之间关系的制度的产物。一个整合框架有时候是个体而有时候是集体的,充满着身体、语言、思想的多重互动。统一战线作为体现国家能力的策略,嵌入是其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一个能够同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sup>[25]</sup>这是中国社会政治行政科层之外较为灵活的嵌入方式。这种嵌入不仅是基于历

史传统和当下社会文化、族群的多元性特征,也是高效政治的一种智慧选择。但前者往往是基于自身在科层制中角色的功能性实践,需要权责规定、政策要求、逐级传达等一系列固定程序和动作。而统一战线除了有政治行政这一科层嵌入,并且有方法上的嵌入,因此具有政治结构和运作方法上的双重嵌入。根据国家稳定、和谐、人心共识等大的策略,价值上的突进在方法上则有灵活选择。嵌入与权力具有天然的关系,尤其作为以人心工作为主的统一战线。福柯认为权力不仅仅在于暴力的象征,权力存在于所有社会互动和社会机构的任何一个层面,每一个人都牵涉其中。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是人际互动的润滑剂。<sup>[26]</sup>具体表现首先在科层上的嵌入,科层上的嵌入主要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甚至近年来一些地区乡政府设立统战委等。其次社会的嵌入,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社会被普遍认为是特定疆域即民族国家内部的大型社区。其社会范畴与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重合。统一战线具有中国共产党机构设置的科层特征,必然也面临着现代国家政治、疆界、主权、人口所规定的这个社会。嵌入社会便是其运作的目标逻辑所规定,而大统战格局无疑更加地强调这种嵌入的广泛性和深度。

### (三)社会资源的吸纳

嵌入的过程也实现着吸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sup>[27]</sup>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国家获取资源的能力。掠夺行为只是汲取能力可以采取的多种形式之一。汲取领域的关键是寻求获取资源的国家与拥有资源的公民之间的关系。福山认为的中国政府全世界最高效的评价中,政治的有效性往往体现在其嵌入和吸纳的深度和广度及有效性,在国家能力中汲取能力是四个能力之一,如果没有汲取能力国家就成了一个干瘪的没有营养的巨婴,也就失去了国家统领社会分配资源的种种能力。在政府高效和国家能力中统一战线既是其中原因之一也是其结果和表征。任何生命有机体通过吸纳外在营养来维系生命所需,而其他非生命的组织实体其存在都需要不断吸纳外在能量来不断完善自身,因为吸纳构成了一种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信息交流和能量

的获得,其结构应是开放的,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吸纳社会各方群体、整合社会资源最终才能实现“引领”的目标。

#### (四)基于交往理性的协商民主

许多地方性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协商与对话,促成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开拓了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在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理性协商、互惠互利、共同承担责任为特征的关系。<sup>[28]</sup>随着世界发展的变化国家能力的本质也在产生变化。前发展阶段更多表现为国家直接从经济中获得资源,而后发展阶段则由于发展所倚重的市场所具有的盲目性更多是通过不断调整经济干预、加强与社会的合作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为了争夺权力和物质资源,社会充斥着竞争和冲突。现代社会的分层是多维的。由于阶层、地位、群体等交织和重叠在一起,导致社会结构变得极为复杂,一个人所拥有的身份也纷繁多样。代表着群体性利益的权威主体也多元而重合,绝非韦伯认为的法理性权威、传统权威、克里斯玛权威三者清晰的分野,而是重叠交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正是这一点才能构成协商民主的基础。有分歧,才能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求得统一与协调;在有限度分歧的基础上,通过交往理性和协商民主才能重构社会“和谐”。<sup>[29]</sup>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协商原则正是对差异性的尊重和不同诉求导致冲突的包容性化解。这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了极为有效的作用。关注国家与民间社会何以通过偏好转换而非偏好聚合,在对话协商中将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最终实现国家权威与民间力量在互相认可中和谐相处。与强制性权力不同,这是协商民主所赋予更持久有效基础性权力的政治过程。国家通过与社会的持续沟通、协商来聚合两方以达成国家目的。协商民主是潜能巨大的治理形式,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相互理解,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即整体的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sup>[30]</sup>。互动与认可是统一战线在民主协商中的基本方法论准则。这是贯穿协商民主的主旨,只有通过一种互动过程才能通过交往使不同的团体和阶层跨过彼此职业利益的界限发生融合,至少在观念上形成一种认同并形成共赢乃至互补的共识。对此兴起的

治理理论,同样对共同体内多向度的协商机制表现出高度关注。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竞技场,参与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辩论,寻找解决方案。统一战线作为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机制,通过民主协商的功能,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等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与协调,为各方面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和政府了解各方面利益诉求提供有效的途径。

#### (五)话语体系理性沟通与整合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流,矫正政府行为与公共选择之间的偏差。<sup>[31]</sup>统一战线具有连接政党、社会与国家的理性沟通与整合优势,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经典社会学理论也认为只有在社会情境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听懂对话,仅靠语言本身是做不到的。<sup>[32]</sup>国家与社会是传统政治学二分法划分主要内容,其构成了人类文明维系自身秩序的基本结构力量。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资源汲取能力,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农业国家的分界线,而国家的协调能力则是当代国家能力的标志。<sup>[33]</sup>在前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教和君权来实现,自现代以降对自然物质认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导致人类认识世界的祛魅和组织体系的精细化,进而导致现代政党成为一种维系国家与社会力量日益登上历史舞台。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通过政党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得以实现。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中统一战线是重要的媒介和法宝,也构成了政党与国家同构中极为关键的体制性和策略性设置。就事实表现而言统一战线在连接社会和国家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地位和角色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这主要表现为统一战线日益强调的大统战格局,在纵向上贯穿党中央和基层,并在科层制结构中具有极大穿透力。在横向上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统战对象和内涵,将处于不断分化的更多阶层纳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和范畴之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自由贸易和统一市场成为消弭传统群落包括家庭、社区等的集中性力量。社会不再是按照一定的群体包括家庭为单位的组合,而是逐步走向以职业、爱好等进行重组,每个人都成为理性经济人,不再按照传统的社会规则运作。涂尔干也认为传统社会是靠宗教、仪式等维系社会,个人被淹没于社会之中,因而是机械社会,而现



代社会分工使得个体被释放出来,必须需要法律进行秩序的维持,现代社会是有机社会。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个人现代转换、民族文化现代适应性问题与非理性的利益需求相纠缠,可能将自身现代化带来的一些困惑、迷茫,竞争压力等不适感与国家能力、社会公平划等号。正如有学者认为国家的敌人从来不是文化多样性本身,而是以文化多元主义、差异化、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为价值资源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统一战线可以通过自身优势,衔接社会与国家,将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研判并纳入国家政策予以解决。政治学家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对沟通交流的依赖。沟通交流越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互相平行,谁也离不开谁。<sup>[34]</sup>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基本的,也是改变或强化政治观点的最有效途径。<sup>[35]</sup>

### 三、统一战线的政治效能

#### (一)组织优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统一战线几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厚的工作经验、人缘、情感基础,在具体工作中也能够突破一些教条,对一些刻板政策并及时向上反馈不断完善。同时统一战线具有纵向从中央到地方和横向关联各行政部门科层制以及广泛联系社会组织优势。这种组织优势既具有制度化、规约化和上传下达的科层优势,又有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与价值引领。这种组织优势表现在现代行政效率上就是政策传达的直接性和高效性,并能防止科层制过程中政策和命令传达的机械性,赋予了各级统战部门和人员相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这种组织优势就在于及时的沟通性,而一个社会和谐发展最需要的就是诸如重视社会成员利益表达并及时反馈和沟通。统一战线既具有科层制传达的快捷性和直接性,又有着超越科层制机械性这一优势,同时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神圣使命,因此在沟通和协调过程中既有国家立场又将不同文化放置在具体场域理性审视,因此协调关系的优势极其明显。能够通过组织自身的特点,所用方法的有效性,政策传达的直接性是社会群体和政党、国家的重要协调力量并引导前者真心认同后者。近几年大统战格局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力量和覆盖范围,因此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引导有着体制机制上的优势。

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进步并保持总体和谐

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城乡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过大和就业压力加大、不同群体利益冲突增多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主动、及时地处理和化解各方面的矛盾。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特殊的群众工作,是党加强同各方面群众联系、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能够以协商、沟通、引导、服务等方式,促使一些社会矛盾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统一战线具有纵向的衔接优势,能够为政策的上传下达提供路径。统一战线能充分发挥自身联系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领域等群众优势,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从而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另外统一战线能充分推动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和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

#### (二)资源优势促进社会发展

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法宝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了非凡成就,这是其蕴含着资源整合优势的历史证明。统一战线长期面对的不同群体、所使用的政策方法、社会网络都是难得的资源优势,而这些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统一战线面向社会发展所必需的。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虽添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句,其范畴意蕴和包容性则是几何数倍的增长。这说明统一战线着力于调动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面向工作的对象不可限量。同时对象也是资源,其外延是资源所扩展的庞大的群体界限。

具体而言统一战线对象包括一些政协委员之外的管理者、企业家、技术人才等界别精英的智慧人士和力量,因此可以充分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优势,抓住当前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机遇,一方面为本地区企业之间提供沟通渠道和机会,以弥补市场这一看不见手所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恶性竞



争。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和项目争取工作,把更多的项目、资金、技术、人才吸引进来,做大做强以资源换产业、促发展、增实力、促就业、助民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地方社会高质量发展。

### (三)智力优势凝聚发展智慧

亚当·斯密在讨论财富问题时,有意识地排除了物理意义的自然。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及疆域的大小如何,其每年生产的丰富或缺乏必定由于独特情况之故,依两个因素而定——即劳动的技术,以及社会上生产者与安逸者之间的比例。他所考虑的并不是自然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sup>[36]</sup>统一战线充分重视人心的力量并调动人的因素,发挥和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致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人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人才事业在任何事业中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对于统一战线人才和智力无疑也是关键中的关键。统一战线工作面向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等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丰富,具有“智囊团”和“人才库”的作用,能够及时把各方面意见建议、利益诉求传递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因此能引导统战成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建诤言、献良策、出实招,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也能引导统战成员围绕营商环境优化、民生项目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民主监督,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 (四)民主协商的方法优势整合多元力量

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原则和民主协商的沟通机制使其作为法宝最大的优势,而其本质是联盟、团结、统一,其最基本的条件和方式是发扬民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党外知识分子及新型阶层等对象,在这些对象中聚集了一大批专业上有造诣、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他们分布在社会各行各业,掌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社会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统一战线团结联合他们的主要方式是协商、对话、沟通、交流,把他们的思想、智慧、力量凝聚到社会发展上来。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政府出题、党派调研、部门落实的调

研工作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不断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为民主党派、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等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献计出力创造便利条件。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决策,使他们真正通过民主协商这一途径当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参谋助手。

同时,在全过程民主政治优势中协商民主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意蕴,承认不同群体利益多样,在平等、宽松的氛围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协商讨论。通过广泛的全过程民主与协商,深化理性认识、消除非理性与误解、增进理解与共识。通过协商,能够多听意见、广开思路、汇集众智、精谋良策,把社会各方面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进行系统、综合地反映,听到各种真知灼见、各种真招实招,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总之,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统一战线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政治策略和表现,是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产物。事实证明在伴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百年过程中统一战线形成了自身政治文化和逻辑,并不断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发挥着基于这种逻辑的效能和优势。挖掘和阐释其中深刻学理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这一过程的科学性所在,也是挖掘和理解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优势及策略并进行相关对策的思考,既是学理理性的使命也是统一战线的责任使然。

### 参考文献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9.
- [3]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4][美]朱迪丝·N.施克莱 [美]斯坦利·霍夫曼.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王容美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29.

- [5] Van Vliet Kooiman,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K. Eliassen and J. Kooiman (eds.), *Managing Public Organizations* (2nd edn.) London: Sage [M]. 1993:64.
- [6] 学习篇目: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EB/OL】. 网易, <https://www.163.com/dy/article/1M94H3F70514PGCM.html>.
- [7]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编委会.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 1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60.
- [8][美]罗斯金. 政治科学. 袁林震译【M】. 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65.
- [9][10][11][美]弗朗西斯·福山. 毛俊杰译.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 1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08;117;88.
- [12][美]默顿. 社会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 袁齐心译【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8:726.
- [13][美]罗斯金. 政治科学. 袁林震译【M】. 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09.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1 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 2018:44.
- [15]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M】. 1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21.
- [16] 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1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134—135.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1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03.
- [18][美]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毛俊杰译【M】. 1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12.
- [19][美]斯密什. 阅读斯特劳斯. 高艳芳译【M】. 1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245.
- [20][美]罗斯金. 政治科学. 袁林震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35.
- [21] 埃伦·M·伊梅古特. 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6).
- [2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7-2.
- [23][德]汉斯·约阿斯. [德] 沃尔夫冈·克诺伯. 社会学理论二十讲. 郑作彧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317.
- [24] 李路路.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2).
- [25]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三联书店, 1989:88.
- [26]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基本概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292.
- [27]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129.
- [28] 陈振明. 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5.
- [29] 唐士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
- [30] Jorge M. 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elf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2001-(30).
- [31] 陈振明. 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3.
- [32][33]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基本概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204 ;292.
- [34] 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129.
- [35][36][美]罗斯金. 政治科学. 袁林震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55—156.
- [37] 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Culture, Typewritten Manuscript)【M】.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17.

责任编辑:王昊

# 更好发挥民建在人民政协作用机制思考

梁晓宇 黄 鲁

**【摘要】**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中共二十大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作出了新部署。本文围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主题,从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当前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存在的问题以及更好发挥民建在人民政协作用机制思考三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认识,以期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建 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 工作机制

民建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加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是民建的基本职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充分保障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是加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抓手。

## 一、充分认识民建在人民政协的重要地位

### (一)民建为人民政协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建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成立以来,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中,有民建成员12名。在这次筹备会议上,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被推举为常务委

员会副秘书长。此外,黄炎培、罗叔章被推举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小组,施复亮、俞寰澄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章乃器、李烛尘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胡厥文、俞寰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李烛尘参加宣言起草小组。

### (二)民建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政治力量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人民政协成立之日以来,民建始终保持鲜明的党派属性活跃在人民政协舞台,也是人民政协任何时期都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大政方针和民主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26日,周恩来邀集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12位民建理、监事聚餐,讨论民建前途和今后的重点分工问题。周恩来提议,民建应使民族工商业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他建议,再吸收一些私营及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参加。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参加人民政权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BKS046)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四川省党的建设研究智库研究员,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

黄 鲁,男,民建涪陵区委会专职副主委。

和人民政协工作,配合国家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人民政协是民建履行职能的重要平台

人民政协是由不同的界别所组成的,民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始终贯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在政协的组织机构内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本身就是人民政协组织的基本功能,也是民主党派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如1993年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提出4点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更有利于其贯彻执行,更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三是政党体制是现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四是现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时机很好,错过不得。建议提出以后,在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成功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 (四)发挥民建作用是人民政协自身建设重要内容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人民政协的定位和性质决定了在政治协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能够同时发挥,既能实现团结稳定的前提下发扬民主,又能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维护稳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优势之一。《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第七章政治协商保障机制第二十九条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地方重要举措的讨论协商,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等作

出机制性安排。

## 二、当前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存在的问题

当前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总体上能够代表民建界别的群众呼声,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但离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和民建自身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

### (一)民建方面

#### 1.参与政协履职意识有待强化

在人民政协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一些民建成员履职意识不强的情况;或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参与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不积极的情况;或将民建当成一种投机取巧的平台,热衷于享受政治待遇,缺乏担当意识,与新形势下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要求不相适应。

#### 2.参与政协履职能力有待提升

部分民建成员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对民建宗旨、统战和人民政协理论及履职业务知识学习不够。有的民建成员甚至不知道基本职责和义务。也有一些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与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步性、衔接度不够,以至于所提意见建议缺乏针对性、操作性和落地性。

#### 3.参与政协履职实效有待增强

民建参与人民政协的平台有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有少数。民建成员大多本职工作繁忙,参与人民政协的频次、范围、形式也十分有限;一些民建成员调研不够深入,议政建言的质量不高。少数部门对民建履职重视不够,影响其在人民政协的作用发挥。一些民建联系本届别和基层群众不够、了解社情民意渠道不宽,参与人民政协作用发挥欠佳。

#### 4.参与政协履职合力有待加强

民建成员履职监督评价机制实效性不足,约束力不够;民建地方组织统筹协调不够,引导民建成员参与人民政协机制不完善;一些单位对民建履职及所提建议重视不够,使民建参政议政期望受挫;中共组织与民建、民建与特色界别、党派成员之间沟通渠道不畅,影响了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履职。

### (二)中共组织方面

#### 1.人民政协自身发展不平衡

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但也有一

些中共地方组织对民建参与人民政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认为中共党内人才济济,民建意见无足轻重,甚至将其看成消极力量。也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不熟悉人民政协工作,对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关注支持不够,工作方法简单,甚至搞“一言堂”,要求民建人士绝对服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的积极性。

#### 2. 协商制度体系建设有欠缺

协商制度还需完善,虽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建协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但在地方政协没有明确哪些是必须协商内容,哪些可以纳入协商。协商形式主要是提案和会议,而会上发言缺乏跟踪落实,导致协商不协商是一个样;协商关系上,中共占有绝对优势,而民建行政资源十分有限,导致政治协商大多数是一个程序性协商;在协商过程中,目前也没有细化明确中国共产党、民建、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的角色定位。

#### 3. 政治协商成果宣传需加强

人民政协成就宣传力度不够,特别是对各民建在人民政协中协商成果宣传不够。中央层面规格高就宣传多一些,而地方政协宣传力度总体不大,既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更没有对民建参与人民政协的专题宣传,与中共地方党委政府宣传声势形成巨大反差,导致社会对民建认同度不高。

#### 4. 协商监督评价机制有短板

各地人民政协内部监督评价机制尚不统一。中央层面没有对各级人民政协实施绩效评价,地方层面也没有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人民政协监督评价机制。人民政协议题与各级党委、政府沟通不多,导致人民政协对本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把握研判存在局限性。对政协委员的考核评价实效性有待提升,一些地方对政协委员存在以提案为中心的考核评价机制,导致政协委员为了完成提案而写提案,没有能够时刻做到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

### 三、更好发挥民建在人民政协作用机制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建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为此,要更好发挥民建在人民政协的

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需要从中共组织和民建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健全完善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机制。

#### (一) 中共组织方面

##### 1. 强化思想引领,建设人民政协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大团结理念,充分认识民建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筑牢共同思想基础。优化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体制机制,用好求同存异、民主协商等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联谊交友、恳谈会等新型工作方式,灵活处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建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注重培养民建优秀人才并纳入政协委员队伍,及时准确全面反映社情民意,化解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为民建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 2. 健全制度体系,深化政治协商

完善顶层设计,各级建立健全政协议题沟通会商机制,定期研究制定政协议题指导目录,确保政治协商不偏题。规范协商程序,严格按照政协章程,推进人民政协活动,出台细化的政治协商流程,注重跟踪问效和协商反馈。创新协商形式,改变由政协为主体召开协商会议单一方式,探索由同级党委召开重大决策、重大政策落实专题协商会,邀请同级政协班子成员、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委员参加协商。提高协商实效,对纳入协商的议题要改变事后才协商倾向,要多做决策前协商,少做程序性协商,要注重听取民建和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存在重大分歧的要多沟通、多商量,力求达成一致。

##### 3. 支持党派发展,壮大委员主体

立足委员主体地位,积极为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支持民建按照各自界别把优秀代表人士吸纳到人民政协中来,培养一批优秀民建政协委员。整合利用资源,加大对民建政协委员培训力度,提高其政治理论素养和政协履职能力。注重选派民建政协委员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重大工程项目和经济业务主管部门挂职交流,丰富其阅历,切实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 4. 加强宣传评价,营造社会认同

建好人民政协宣传阵地,加大人民政协对外宣传力度,对政治协商重点议题要开辟宣传专题。要将民建在人民政协的作用宣传报道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宣传民建历史沿革、爱国主义传统和政协履职成效。各级要认同本单位民建成员履职成效,在年度考核中要统筹考虑其党派工作开展情况并予以适当倾斜,对民建人士荣获各级人民政协或民建内部表彰奖励视为同级党委政府表彰事项同等对待,定期和不定期与民建人士交心谈心,营造长期共存、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良好氛围。

## (二)民建方面

### 1. 坚持正确方向,提升政治把握能力

坚定不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坚定不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明确参政党职能,发挥好参政党作用;坚定不移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好协商民主重要主体的独特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深化政治交接,坚持发扬民建老一辈的政治信念、高尚风范、优良传统,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持续健康发展。注重发挥民建的传统优势和界别特色,有序参与扶贫助困、支教帮教、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活动和公益事业,扩大党派的社会影响力。

### 2. 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引导民建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注重教育培训,加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多党合作制度、统一战线理论、党派历史、章程,特别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方式与途径培训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引导民建成员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充分发挥榜样力量,开展“传帮带”活动,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每

年评选表彰先进,对重点课题和协商活动适当安排经费。对热心民建事业、议政建言能力较强的成员,在政治安排和实职配置上予以重点推荐,优先使用,进一步激发民建活力。

### 3. 加强班子建设,提升组织领导能力

优化选拔机制,坚持民主和阳光原则,选优配强民建地方和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民建地方组织要加强统筹协调,引导支持参与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提高民建基层自主权,调动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坚持民主集中制,注重观念、利益、信息、方案、行动的整合,处理好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以达到发扬民主、维护集中、增强团结的效果。

### 4. 争取多方支持,提升合作共事能力

积极争取中共党委政府支持,主动向所在的中共党委、人民政协、统战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汇报工作,争取更多的物质和政策保障;引导民建与中共党员、无党派人士建立密切的合作共事关系,建立和谐党派关系。发挥民建地方组织指导作用,对民建参与人民政协履职实施分类管理和具体指导。不断优化民建基层组织结构,科学制定组织发展规划,积极建设属地化、行业化基层组织,提高民建的凝聚力。

### 5. 健全规章制度,提升解决自身问题能力

分年度制定组织发展计划,用足用好发展名额,保持界别特色,积极发展符合党派特色的人士,稳妥发展非重点界别的代表人士。严把成员入口关,注重吸收参政议政复合型人才;拓宽发展渠道,向中共党委推荐优秀人才。学习借鉴中共组织经验,进一步规范民建组织生活、发展成员、推荐干部、述职考核等方面制度,建立民建理论学习、议事规程、组织发展和内部监督制度等,实现民建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健全民建成员内部考核机制,加快构建科学、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民建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责任编辑:李霞

# 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研究

——以甘肃民盟组织为例

鲜新莲 王 昊 郭文君 刘 燕 胡冰梓月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背景和必要逻辑及相关研究动态,以甘肃民盟为例,提出了提升党派政治把握能力、夯实政党协商政治责任、发力民主监督强化参政议政工作引领、强化国家治理参与意识等五条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方式与路径,进而对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的困难进行了阐述,提出夯实民主党派干事创业平台,给党外干部“给位子”;注重提高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给党外干部“筑篱笆”;强化民主党派履职尽责能力,对党外干部“强根基”;整合民主党派利益表达渠道,给党外干部“搭台子”等建议。

**【关键词】**民主党派 全过程人民民主 甘肃民盟实践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阐明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重要部署,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部署,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明确为未来五年和到二零三五年的重要发展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sup>[1]</sup>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概括,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具有完整的制度安排、丰富的民主实践和突出的治理效能,为民主党派

参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政治力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主党派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提出了更高要求、开拓了更广阔空间。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参与对象,如何更好推进协商民主、乡村振兴、民主监督、咨政建言,既是新时代赋予民盟的新使命,也是民盟参与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积极搭建和丰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平台载体,拓宽党派成员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畅通群众反映诉求渠道,不断拓展民主路径,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党派有序政治参与,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 一、背景动态分析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基金项目:**民盟中央2023年度民盟参政议政研究立项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鲜新莲,女,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课题组长)。

王 昊,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民盟兰州市安宁区基层委员会主委(课题执笔)。

郭文君,男,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课题组成员)。

刘 燕,女,兰州市安宁区培黎小学副校长,民盟兰州市安宁区基层委副主委(课题组成员)。

胡冰梓月,女,兰州市市场监管局安宁执法队副队长,民盟兰州市安宁区基层委组织委员(课题组成员)。

1.研究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价值的背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其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要求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又分别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进了历史决议和党代会报告。民主党派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主体,在践行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扮演重要力量角色,在此背景下研究民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与逻辑、经验和成果显得意义重大,也从新型政党制度和参政党视角检视与反馈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效能。

2.研究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价值的必要逻辑。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与活力,但从民主党派维度详尽而细致研究探赜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作用、成效和进路问题等方面还显得力量单薄、数量欠缺,加强此方面制度体系、实践链条和结构谱系的探讨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与现实逻辑。以知网搜索为例,搜索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民主”“民主党派”(表一),从数据中(2023年数据截止时间为11月29日上午6点)可以看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关键词,2012-2023年发表文献数量最多,达4431篇,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民主”“民主党派”为关键词,数量最少,仅有31篇,说明以民主党派为切口研究参政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基层民主中发挥作用的理论文章偏少,且发布稿件多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学报,社会科学领域需要在此领域发力,形成研究合力,弥补研究短板;从分年度数据情况看,二十大以后2022年和2023年两年发表文献篇目最多,说明自二十大之后,学界高度重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民主”等理论课题研究,成果丰硕。

## (二)国内相关研究动态情况分析

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更多通过参与基层民主实践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本文更侧重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入手做简要分析。(见表一)

表一 2012-2023年“全过程人民民主”发表文献统计表

| 发表篇数(篇)<br>年度 | 关键词     |                 | 备注                      |                    |
|---------------|---------|-----------------|-------------------------|--------------------|
|               | 全过程人民民主 | 全过程人民民主<br>基层民主 | 全过程人民民主<br>基层民主<br>民主党派 |                    |
| 2012-2023     | 4431    | 357             | 31                      | 其中期刊12篇<br>学位论文19篇 |
| 2023          | 1686    | 180             | 9                       | 其中期刊8篇<br>学位论文1篇   |
| 2022          | 2134    | 147             | 6                       | 其中期刊3篇<br>学位论文3篇   |
| 2021          | 670     | 1               | 1                       | 其中期刊1篇<br>学位论文0篇   |
| 2020          | 17      | 1               | 1                       | 其中期刊0篇<br>学位论文1篇   |
| 2012          | 1       | 0               | 0                       | 其中期刊0篇<br>学位论文0篇   |

当前,学界更多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操作程序,聚焦基层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操作、可实践的领域和可复制的方案,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发展空间。<sup>[2]</sup>张君指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源于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这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有根有源。<sup>[3]</sup>唐亚林的研究表明,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的重要构成,以各类重大法律、重大规划、重大决策、重大项目为主的立法联系点制度、(网络)意见征求征询会、专家座谈会、听证会、恳谈会、评议会、议事会等决策议事协商会议民主制度三大直接民主形态。<sup>[4]</sup>许洪位认为,宏观层面的民主制度常常具有稳定性,因而要使静态意义的民主制度发挥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性功能,就必须在实践民主的过程中,建设更加全面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运行机制,从而使宏大叙事的民主制度有效运转起来。<sup>[5]</sup>刘杰总结说,中国不仅明确规定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等都得到了同步的推进,如此丰富的民主形式的同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步性……需要从实践中得到检验,也在实践中得以不断推进和完善。<sup>[6]</sup>



接受和吸纳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民主党派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也能够丰富和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厚度。

## 二、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方式与路径

### (一)提升党派政治把握能力,以政治站位牢固合作初心

政治把握能力是民主党派最主要、最基础、最根本的能力,是检验民主党派政治上成熟不成熟、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主要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党政治格局和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以及具体工作实践中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政治贯彻力等。<sup>[7]</sup>甘肃民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四梁八柱;坚持围绕自身界别特点,牢牢守住主阵地,谱写出牢固合作初心的新篇章。

民盟天水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中共二十大精神,积极开展“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全面落实新时代民主党派建设的新要求,提高党派政治站位,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项工作在创新实践中取得了新进展。

### (二)夯实政党协商政治责任,以协商方式激发多党合作效能

政党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全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体现着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使命担当。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和政治责任。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搞好合作共事,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确定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进一步明确:“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多党合作经验基础上对民主党派基本职能作出的科学概括。甘肃民

盟高度重视政治协商工作,和党委、政协、统战部紧密联系,通过全方位参与和开展政治协商,夯实了政党协商政治责任,以协商方式激发出全省多党合作新效能。

以民盟兰州市委为例,按照新型政党制度要求,认真负责参与情况通报会、征求意见会、专题协商等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工作,领导班子和盟员中的代表人士积极主动参加市委、市政府举行的与党外代表人士的迎新年茶话会、新春团拜会,参加中共兰州市委组织的党外干部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征求意见会,参与各类协商民主会、专题座谈会和调研考察活动等,以会议发言或者书面材料的方式,就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政党协商计划、“十三五”规划等的修改等议题,发表意见建议。在重要人事协商会上,对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建议人选进行协商。参加中共市委举办的调研课题协商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通报协商座谈会,提交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养老产业发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结果等重要问题建议,得到中共兰州市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接受和落实任务,定期向盟机关反馈情况,政治协商成绩斐然。

### (三)发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以监督方式扛起协商民主担当

民主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全链条上的特色型环节。“一个国家如果纲纪不正,其国风一定颓败”,<sup>[8]</sup>权力历来在得不到有效约束、随意滥用的情况下,就会如同离弦的箭矢,有极大可能失去控制,说明对权力进行有力监督,才能预防和遏制腐败。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制下,实行民主监督,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各民主环节相互衔接,达到了“人民至上”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目的。民主监督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五大实践链条中属于涉及全过程、全领域的复杂系统,民主选举、民主协商等其他民主环节都离不开民主监督。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主监督是保障各民主链条环节高效运转、发挥作用的手段。民主党派参与监督的方式主要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监督、民主党派专项监督以及民主党派党内自我监督。

甘肃民盟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民主监督活动,确实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协助省委、省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提升了执政党科学、民主执政水平,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做出了贡献。

民盟庆阳市委恪守“立党为公 参政为民”的理念聚焦党委和政府工作,将提升民主监督水平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来抓,勇于讲真话、讲心里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充分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盟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行风监督员、行业监督员、行风评议员、人民陪审员、特约研究员、监察员、劳动仲裁监督员充分利用人大视察、政协视察、议案提案办理答复意见、大会发言等形式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在优化全市营商环境、乡村治理工作等方面调研监督,促进了庆阳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主政治建设。庆阳市民盟现有庆阳市优化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1人,参与2次督查调研;3名盟员全程参与庆阳市委统战部联合调研工作组,赴八县区调研监督22个行政村的乡村治理工作,形成书面调研报告,同时参与“关于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1次。2021年至2023年,民盟天水市委开展了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市委会主要领导带队多次深入相关县区、乡镇、村庄、企业和项目建设地开展调研,现场指出问题督促落实,形成的专项监督调研报告被市委领导批示。

(四)强化参政议政工作引领,以建言方式推进民主决策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重要抓手。民主党派多渠道多路径吸纳民意民智,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党领导人民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民主决策提供高质量咨政建言,保障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进行,提升了公共决策的水平,民主程度远胜西方的伪民主。甘肃民盟将人民民主落到民主酝酿、民主立言、民主建言等民主决策诸环节,依托自身界别优势,聚焦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依托民主协商达成协商共识和决策共识,推进民主决策,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民盟酒泉市委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和要求,不断强化参政议政思想引领,通过参加政治协

商,参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出参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专题会议与重大活动开展学习教育强化思想引领,提升盟员政治理论修养。二是积极建言献策,提高参政议政质效。主要措施有提升参政议政管理工作机制。如制定了《参政议政委员会工作职责》《关于加强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意见》等规章制度;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参政议政履职培训;规范参政议政工作计划、课题、调研、成果论证,提案审修。近三年来,在市“两会”上共提交人大建议、政协集体提案135件,大会发言6篇;社情民意信息93篇;申报政协协商课题7个,民盟省委会年度联合调研课题7个;《加强小区物业管理的提案》被市区(宿州区)政协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和优秀提案;调研组撰写的《关于推动酒泉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得到了酒泉市委书记批示。

(五)强化国家治理参与意识,以尽责方式践行民主行动

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特有的、完备的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孕育的高质量、高层次民主,民主党派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具备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能。甘肃省民盟关注和重视群众利益表达需求,充分参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统战部门搭建的表达平台,如党委、统战部门层面的协商议事会,人大层面的人大代表之家,政府层面的协商座谈会、专家咨询会、听证会,政协层面的政协委员之家、界别活动室、民盟自身的“盟员之家”等平台,聆听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愁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难心事,为人民群众发声,为政府决策支招,切实落实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实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sup>[9]</sup>

三、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的困难与解决建议

(一)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的问题

1.国家顶层设计方面:给民主党派干部创设的发展空间还不够,导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存在力量“单”情况。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民主党派的政治

交接和政治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党内法规及文件对民主党派政治交接、政治安排等基本问题予以明确。但就民主党派的发展来讲,文件执行存在连续性和地区性差异,尤其县区一级,执行相对弱化,党派干部力量“单”对民主党派扎实有效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一定影响,亟待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从制度、条例等方面予以规范解决,做到国家、省、市州、县区层面都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给民主党派干部创设更大更多干事创业发展空间,增强其政治实践历练,提升政治把握能力,来支持做好民主党派政治交接、政治安排和组织建设工作。

以甘肃省为例,据调研,陇南市市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共配备党外干部5名,9县(区)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共配备党外干部26名,党外代表人士在市政协五届委员和常委中的占比分别达到60.17%和34.48%;<sup>[1]</sup>而临夏市民主党派市级组织中民盟仅配备一名专职秘书长,机构建制和实职安排地区差异明显,不利于党派开展相关工作,对夯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调动党派干部工作积极性存在不利影响。

2.政治把握能力方面:对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具备的政治能力要求尚欠严,导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出现)党性“弱”局面。加入党派前:民主党派在吸纳组织成员时往往相对偏重其社会地位、自身光环和专业水准,对其政治思想表现则缺乏细致了解,导致一些人员加入动机不纯,目标不明,对党派在理想、信念、自身发展定位等方面都欠缺内心有效认同;加入党派后,由于党派自身的结构与工作特点,政治理论学习和培训相对较少,加之本职工作较忙,导致这部分成员很难形成一心为党、注重奉献的自觉性和凝聚力,政治站位不高,履职热情降低,缺少民主党派成员应具备的“党性”,甚至党派意识淡漠,沦为“僵尸成员”。这样,就难以高质量发挥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价值,影响了民主党派组织的形象。目前,甘肃各级盟组织或多或少存在一小部分不参加党派活动的类“虚拟”盟员,其它党派也存在同样问题。

3.履职工作能力方面:民主党派履职完成的质量效力尚欠深,导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凸现成效“软”情势。时代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民主党派适应形势、紧跟时代步伐,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目前,民主党派履职成效显著,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上紧下松基层建言发力不够;民主监督的涉及范围还不够宽;理论研究尤其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参政议政实践研究、智能数字化时代参政党建设等方面缺乏创新和集智研究力度;各民主党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往往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协商合力等问题。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党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主体地位与职责使命,坚持多元协同治理,共同协作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积极参政议政、提高履职效能,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助力中国共产党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整合利益诉求,协助中国共产党化解国内外风险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提升和优化国家治理效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论转化为践行效益。甘肃民盟在发挥协商合力、助力中共科学化与民主化决策方面尚有一定差距。

4.利益表达途径方面:民主党派协商利益表达渠道整合还欠实,导致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路径“散”态势。当下面对社会多样化、利益多元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以人大协商、政治协商、政党协商制度形式,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集中、整合群众分散、多样、无序的意见和利益,让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利益和诉求得到表达。民主党派在基层协商转化利益整合过程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自身参政议政、资政建言、民主协商的实效。但目前,基层协商的路径较多,且呈分散状态。以甘肃为例,省级层面有省长信箱,市级层面有12345热线,基层层面有人大代表工作室、政协委员协商议事室、党派之家(如民盟的“盟员之家”)、民主党派与基层党组织互联共建社情民意联系点、小区党员阵地等多种协商路径,并在各自的渠道里运转与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各渠道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呈现各自为政样态,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鉴于民主党派成员数量较少,

最小代价最大效能是基层民主协商凸显作用的必要考量,有效整合现有利益表达路径以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显得十分必要。

## (二)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思维路径

1、注重夯实民主党派干事创业平台,给党外干部“给位子”。党和国家对民主党派干部发挥作用十分重视。汪洋同志在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上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厚植统一战线人才基础。”<sup>[12]</sup>建议从顶层设计上制定系统、长效的党外干部任职、挂职、交流制度,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建立党外干部后备人才库,规范监察员、行风监督员、行业监督员、行风评议员、人民陪审员、特约研究员的选拔和运行机制,并加强培训和培养,把党派优秀成员推介出来,厚植和积淀统战人才,让“有格局、有胸怀、有眼力、精创造、明底线、树正气、有原则”的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及有关人民团体任职和多岗位交流、挂职,加强实践锻炼,使他们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所联系群众不断走向进步、致力于共同事业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积极作用。天水市近一年在市政府部门安排了4名党外干部(包括民盟界别)担任正职,对天水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2、注重提高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给党外干部“筑篱笆”。要坚定党派成员的理想信念,心怀国之大者,不仅筑牢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型政党制度、党派的政治信仰、政治认同,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在具体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参政工作中的坚定立场,重点是在重要场合、关键时刻、重大事件面前的立场,要在新兴网络媒体上保持正确政治站位,筑好抵御不良意识形态言论的“篱笆”,言谈言论体现出党派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要借鉴中共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政治实践历练、恪守组织纪律;要探索一整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学习方式方法,可以考虑采取用党派民主生活会、党派专题组织生活会、主题教育、参政党党性教育、参政党党日活动等方式进行系统有效的学习<sup>[10]</sup>,杜绝形式主义,做到入脑入心,发挥作用。

3、强化民主党派履职尽责能力,对党外干部“强根基”。新时期,参政党需要不断强化履职尽责能力建设,提高参政协商的水平,才能把新型政党制度下多党合作长期积累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经验和基层现代化治理实践经验不断应用于国家治理,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以及群体,为国家治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sup>[13]</sup>要着力提高基层组织成员资政建言能力,提高建言质量;争取中央层面提供和支持党派自身界别特色方向的民主监督工作,做好所承担的民主监督工作,加强基层民主协商;重视和集智做好在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参政党实践研究、智能数字化时代参政党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创新研究。

4、整合民主党派利益表达渠道,给党外干部“搭台子”。整合民主党派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利益表达效果,是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等履职行为“任督二脉”的关键,卓有成效地给基层民主党派干部参政议政搭好戏台。

(1)组建以民主党派、信访部门、基层街道或者社区为主体的“社情民意甄别答复意见听证会”机制。鉴于省长信箱、12345等群众意见表达渠道有问必答机制,有些不好处理的群众意见建议通过新机器的建立和使用可以合理、科学、有效甄别处理。

(2)建立各党派基层协商合作议事网络平台,整合相同内容的基层协商民主活动,用党派合力高质量解决问题,避免相关资源、人力等的浪费。要加快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支撑的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平台建设,提高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效率和效能。

(3)在基层县区街道层面,将人大代表工作室、政协委员协商议事室、党派之家(如民盟的“盟员之家”)、民主党派与基层党组织互联共建社情民意联系点、小区党员阵地等多种协商路径整合,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线上线下和新媒体通道协同发挥作用,做到时间、议题、地点、人员统一规划落实,也

让群众少跑路,避免会议多造成的市民“怠会”“畏会”“厌会”心理,进而妥善扩大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实践的覆盖领域,逐渐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质量指数、数量范围。

### 结论与讨论

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内容涉及面广,本文侧重国家顶层设计、政治把握能力、履职能力、民主党派利益表达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赜,希冀对参政党和协商民主研究有一些启发。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俄乌冲突、以巴冲突、美国高新技术封锁与打压给世界和我国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为此,当代中国必须擘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国上下包括民主党派齐心协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我国在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应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贡献。我们以甘肃民盟为例对民主党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进行解读,不难得出结论:在新征程上,民盟要继续与时俱进,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提升五种能力,建设“四新”“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完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者、推动者、维护者的使命与任务,踔厉奋发建设高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华章,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增强和积累实践经验,充分发挥党派治理效能的主观能动性,谱写民主党派参政报国、履职为民的新篇章,为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贡献出参政党的智慧和力量。

### 参考文献

- [1]王炳权.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23(1):1-11.
- [2]桑玉成.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十点主张[J].湖北社会科学,2023(1):27-33.
- [3]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J].政治学研究,2021(4):11-17.
- [4]唐亚林.“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J].江淮论坛,2021(1):68-75.
- [5]许洪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独特优势与形态学超越[J].党政研究,2021(2):75-86.
- [6]刘杰.作为政治过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种形态化的阐释[J].社会科学,2023年(7):5-11.
- [7]李鹏.新时代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及提升路径探析[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2):40-47.
- [8]100条经典法律格言【EB/OL】.大河报?大河看法官方账号,(2020-04-1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967106781075681&wfr=spider&for=pc>.
- [9]张等文、王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谱系与显著优势[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2):28-35.
- [10]刘蓉华.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思考【EB/OL】.民建中央网站,<http://www.cndca.org.cn/mjzy/zsjs/sxjs/llyd/1107675/index.html>.
- [11]陇南市运用“五步法”推动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新突破【EB/OL】.甘肃统一战线,<https://www.gsswtzb.gov.cn/news/show-40967.html>.
- [12]汪洋出席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6/content\\_5622716.html](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6/content_5622716.html).
- [13]刘衍峰、赵麋.原则·价值·实践:中国参政党建设的三维审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7)55-61

责任编辑:马霞

# 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逻辑关联

吉伟涛

**【摘要】**在当今社会,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梳理、探讨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为推进两者深度融合、将共识转化为优势,进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更好地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统一战线 宣传思想文化 逻辑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这两个思想的具象呈现,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建党史中,逐渐发展为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和极端重要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沿革、关联逻辑,对不断巩固和夯实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

## 引言

长期以来,学者对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研究多是集中在统战宣传方面,把统战宣传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的一部分,认为统战宣传工作是各级党委统战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必要工作。这方面研究比较繁多,成果比较丰富。截至2023年11月中旬,在中国知网上以“统战”+“宣传”为题检索,找到学术期刊文章302篇,学术论文3篇;以“统一战线”+“宣传”为题检索,找到学术期刊文章89篇,学术论文4篇。这些研究主要是站位统战宣传工作对象(如,焦建桥等人的《关于加强高校学生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如何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如,吴少强等人的《统战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对策研究》)、不同时期背景下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如,张洋的《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优化策略研究》)等<sup>①</sup>角

度,从微观、实操的层面对开展统战宣传工作进行了一定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议,但系统性研究不足;从宏观、理论视角,就如何架构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叠加两者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还很少。本文期望通过梳理、总结、归纳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实现“大宣传”助推“大统战”,“大统战”服务大发展的目的,并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增添微薄之力。

## 一、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与党同时诞生、同步成长的,是伴随着中国具体实践而发展前进,是一个不断成熟又充满艰辛的过程。自诞生以来就相互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它们在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有着相似相通之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②</sup>这说明,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是历史、现实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在吸收一切先进经验、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我们从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四个历史阶段,对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联系进行梳理。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个时期,统一战线在四个时间节点依次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

作者简介:吉伟涛,男,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四级调研员。

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概念也随之进行演变,通常表述为“宣传工作”“政治宣传”“教育宣传”“宣传鼓动工作”等<sup>[3]</sup>,其共同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热情,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它们都呈现出鼓动性、斗争性等“革命”特征。我们以抗战时期为例,来察看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互为影响。此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工作内容重心上,以服务抗战为首要任务。如《党的工作》共计49期,刊发的文章大部分都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关,及时传达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相关意见和指示;在宣传阵地上,除了采取文学艺术、标语口号外,把党报作为鼓动、组织、引导群众的利器,创办了《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的流亡党报。这些贴合中国抗战实际、符合各阶层、各救亡团体的救亡要求的宣传,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巩固和扩大这个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的宣传工作由地下状态逐步转变为公开状态,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统一战线基本政策后,党扛起抗日大旗,如,在新闻机构中秘密发展通讯员,帮助团结进步新闻人士和进步报刊,积极争取新闻界的中间力量,为抗日宣传做贡献,形成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报刊为核心的新闻界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变成全国执政,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对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出了新的部署。此时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广泛凝聚民主党派、民族、宗教、华侨等社会关系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则是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sup>[4]</sup>两者都是无条件执行和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引导作用,呈现出务实性、重建性等“建设”特征。例如,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方面,统一战线工作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25日召开第

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和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在重申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和平过渡方法的可行性;<sup>[5]</sup>随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民主建国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引导资本家进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减少疑虑,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必要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党中央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活动热潮;次年,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重点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正是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团结联合优势和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引导作用,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商界代表的密切配合下,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改革之难,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困难局面和复杂程度不亚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面对一系列的难题、问题和挑战,统战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在建立广泛共识基础上,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画好同心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则通过不断回应、观照人民群众利益的需求,并以此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度来不断夯实群众基础。在贯彻落实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和推动思想理念的变革中,呈现出创新性、开放性等“改革”特征。它们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比如,在党做出建立海外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后,统一战线工作者以文化认同为抓手推进海外统战工作、以祖国统一为目标推进境外统战工作,通过社团联谊大会、培训研习班、国情考察等活动,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提升了海外侨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提高了港澳台同胞的向心力。宣传思想战线随之跟进,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印发《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组织首届中美互联网论坛、首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世界媒体峰会等会议,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全



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情况,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新的阶段,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载体、方法等都发生了变化,两者之间的嵌入度更深、融合度更强,呈现出多元性、网络性等“变革”特征。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6]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显著的社会性;<sup>[7]</sup>宣传思想工作成为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极端重要工作,对于举旗定向、凝聚共识,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提出了“大统战”思想、“大宣传”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sup>[8]</sup>“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习近平:《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新华社,2013年8月20日,第一版。]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广泛凝聚共识,单靠统战实际工作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必须紧紧围绕“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在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五大使命任务中,宣传好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我国的政党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让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统战,使统战工作的同心圆越画越大。事实也是这样,例如,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统战工作从线下向网络空间延伸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载体也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网络成为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新的交汇点;新媒体从业人员既是统战对象的一部分,又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的主体,双重身份加持下,使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交织在一起,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为实践。

## 二、两者在生成逻辑上同源同宗、一脉相承

### (一)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

1840年,恩格斯以弗奥的署名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了文章《唯物论和虔诚主义》,其中

写有“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sup>[9]</sup>这表明恩格斯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统一战线”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创始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全称使用“统一战线”的表述并不是太多,但学界大都赞成统一战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大团结大联合的论述,都认为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活动自古有之,但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工作”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则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1847年6月),章程指出“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sup>[10]</sup>他们通过创办报刊(1848年6月首创《新莱茵报》)、著书立说(共写了1700篇<部>文章<著作>)、印发传单、现场演讲等方式,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宣传,并把“努力宣传革命工作”当作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更是形成了一系列新闻宣传思想。后来,列宁结合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为基础,对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进一步探索,他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强调“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sup>[11]</sup>尤其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作用。这些论述和措施证明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是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工作。

### (二)文化基础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sup>[12]</sup>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一战线形成的社会理想基础;“和而不同”的观念,包含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情怀,承认不同的内在性、普遍性,尊重差异、宽容他人;中国共产党将“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求同存异”原则,“和而不同”思想是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的理论来源。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做到“七个着力”,我们以其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发展提供的源源不断精神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理念,如《尚书·



五子之歌》中载：“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蕴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要素，如《淮南子·修务训》中载：“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厚植“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情怀，如《孟子·梁惠王上》中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可见，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为培育和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丰厚滋养。

### 三、两者在内涵体系上相似相近、相融相通

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都属于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们既有着独特的外在表现和本质特征，又在理论内涵的多个部分有着相互关联，存在极大的一致性。

#### (一)阶级属性高度一致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政治联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护着党的思想舆论阵地，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受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具有举旗定向的鲜明政治属性，从讲政治的角度分析形势、考虑问题是其工作的重要原则。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昭示，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健康发展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上是坚持党的领导、站稳政治立场、具有政治敏锐性、能够政治担当的结果。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四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也印证了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正确前进方向。如，在大革命时期，“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942年，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出现了违背党的政策和一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的倾向，当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人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地党组织要“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sup>[13]</sup>

#### (二)价值导向完全相同

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的政治基因，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始终不渝的初心，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继承了这一特质并持久保持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优良传统。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虽然每个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不同，工作策略存在差异，但统一战线和宣

传思想文化都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群众”是其工作的根本遵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sup>[14]</sup>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统一战线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做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重大论断，无不警示着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工作，把教育引导群众与服务群众有机结合，才能把亿万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才能汇聚起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 (三)工作对象广泛重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工作性质和任务的变化有所不同，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也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即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12个方面的群体，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不同历史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范围也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根据宣传对象不同，分为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对内宣传包含社会全体成员，对外宣传包括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人，港澳台同胞和侨胞、华裔。只是基于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宣传的侧重点不一样，如，延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封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友人、国外新闻记者的到访。总体上来看，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后者的范围比前者更广。

#### (四)目标任务殊途同归

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跟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聚焦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围绕工作方向、目标和着力点的有机统一,把“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相贯通,坚定不移地完成既定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使党的社会地位合法化、壮大了党的自身实力、成为党争取人心的法宝,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统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救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战线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探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初步建构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兴国”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在构建“五大关系和谐”、引资引智方面为党改革开放提供和谐环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围绕基本路线开展工作,激发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富国”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阶段,它们正在朝着“强国”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 (五)核心理念本质相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统战工作“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重大问题。搞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心环节,“聚民心”则是重中之重,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都是通过人的头脑中搞建设的方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 参考文献

- [1] 李翠斌:《新媒体时代 H 省网络统战宣传工作优化对策建议》,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21年,第5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 [3] 张铁军,王喜花:《百年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概念演变、时代特征与经验启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 [4] 刘少奇:《刘少奇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 [5] 王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商业大学,2022年,第17页。
- [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页。
- [7] 《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 [8]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统一论坛》,2015年第3期。
- [9] 习近平:《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新华社,2013年8月20日,第一版。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2页。
-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 [14]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责任编辑:李霞

# 缅怀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诞辰157年,追忆先贤,续写未竟事业

王书波 闫丽琴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领袖。今天,我们迎来了孙中山先生的诞辰157周年纪念日,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敬意。

“振兴中华”“唤起民众”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目标,贯穿着他革命的一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觉醒起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质上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自身求解放的伟大事业,在规模上是东方大国时空范围内14亿中国人民的宏大社会实践;在时代背景上是一个伟大民族国家在世界视野中创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在历史方位上是一个民族由自发朴素现代化走向自觉科学现代化的创新过程、全新阶段。

“振兴中华”“唤起民众”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民主思想被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发扬。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指出:“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了“振兴中华”的第一声呐喊。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用马克思主义之火点亮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灯塔,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轨道,并赋予了新的重要内涵。

157年来,新民主主义不仅使孙中山的“振兴中

华”思想,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而且使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中华的前途目标,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相衔接,使中国革命避免了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成功避免二次革命的问题。在这个方案中,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力量是两大关键要素。

“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旗帜,虽然不彻底,但它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接过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接续传承,将“振兴中华”赋予了新的内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复兴”,逻辑结构上看,民主与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相同的、一样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但领导者和指导思想有所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振兴中华”赋予了全新的内涵,逻辑关系上,基本可以用新旧民主革命对应新旧振兴中华。逻辑结构、逻辑关系,更为清晰;内涵蕴意、历史意义,实践理论,更为突出。振兴中华、为了民族复兴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的“振兴中华”已经汇聚成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事业。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然而,他从小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追求民主的决心。在读书期间,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始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腐败。他组织了多次起义,并最终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然而,这只是他实现民主理想的开始。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他致力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但

作者简介:王书波,女,民革河北省理论宣传委副主任(十届十一届)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闫丽琴,女,民革河北省衡水市委副主委,河北衡水学院教授。

他的努力最终被军阀和封建势力所挫败。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和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他的思想和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中汲取力量,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它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提出,是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主要内容是:对清朝封建专制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坚持了民族、民主救中国信念和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民族、民主救中国,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向。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使农民不致受地主之压迫”。孙中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农民问题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上,形成了系统的土地改革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所倡导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激励人们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从而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理论依据,标志着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三民主义,是其在革命过程中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理论依据。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意义,推动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民主义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

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三民主义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中国实施民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也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除了在政治上实行民族、民主救中国之外,在经济上则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具体又分三个步骤:一、平均地权;二、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三、大赦党见,即开放言论自由。三民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遗产,是激励中国人复兴中华凝聚民心的力量。当然,三民主义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民族、民主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觉醒,推动了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原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三民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内涵,它强调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重要性,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意识,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高度重视和倡导三民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7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感谢他为中国人民、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他的思想和精神,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闫丽红

# 天下无战——推动新时代留学人员 统战工作的思考

——写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10 周年

张 晨

**【摘要】**“大统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确把握“大统战”的“首要三观”，即以牢牢把握统一战线领导权为代表的“政治机关”观、开创更为广阔的国际统一战线空间和国际战略空间的“大统战”价值观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紧迫观。通过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内部视角、工作视角和发展视角的基本考量，在整体观、过程论视域下，十项基础工作：档案、志鉴、博物馆、会史研究、工作理论研究、实体化“留学人员之家”建设、第三方评估、“一老一小”两个特殊年龄、法治化、推动国际化进程等，应当得以加强。

**【关键词】**大统战 留学人员统战工作 智慧留学人员工作

今年是欧美同学会成立 110 周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事业踏上新征程。“统战、统战，天下无战”。“大机遇、大挑战、大目标、大使命、大要求、大发展呼唤大统战”，新时代留学报国事业与留学人员事业交相辉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也必将大有作为。在即将踏进新时代的第二个 10 年的重要时刻，进一步加强对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探索，十分必要，迫在眉睫。

## 一、“天下无战”大统战观

“大统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大统战是更大范围、更强力度、更高效能、更高视野的多维建构。“首要三观”是观察研究分析“大统战”的基本视角，即以牢牢把握统一战线领导权为代表的“政治机关”观、开创更为广阔的国际统一战线空间和国际战略空间的“大统战”价值观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紧迫观。

一是强化“政治机关”观。时刻保持思想斗争前沿阵地意识，牢牢把握统一战线领导权；服务党中央的“第一方阵”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意识；“牢记政治责任、履行政治使命、发挥政治功能”意识。二是树立“大统战”价值观。“天下无战”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也是“大统战”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天下无战”不是“天下不战”，敢于战斗，敢于斗争，方能“天下无战”。统中有战，战中有统，有统有战，合纵连横，开创更为广阔的国际统一战线空间和国际战略空间。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紧迫观。放眼全球，把握大势，立足“国之大者”，始终保持与“大变局”相适应的“前所未有”在场感、临阵感、奋斗感，主动应变危机挑战，于变化中孕育更多利我友我生机，唤醒国际民众，凝聚起世界和平的磅礴之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力。

现阶段大统战以“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为鲜

作者简介：张晨，男，助理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咨询中心七级职员。

明特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统一战线新格局,并逐步发展为较高意识形态层级的政党外交、国家外交形态,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政治统战、安全统战、经济统战、文化统战和生态统战。纵观时代大潮与全球风云,跨越“第二个一百年”,“世界无战”“天下无战”,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或将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价值内核。

## 二、大统战观视域下对党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若干思考

大统战观视域下如何审视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是一个建构、实践且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人民群众的属性是人民性,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完全有别于社会组织。要致力于统战事业、致力于留学报国事业、致力于留学人员事业,做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

### (一)内部视角

一是正确认识欧美同学会自身组织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环节性和效用性,科学做出与其他群团组织创新发展的比拟动态分析,合理定位欧美同学会组织当前的发展阶段特性和将来改革发展的路径指向。二是科学分析同学会组织运转的内在驱动力,静态分析中央支持因素与社会各界支持因素,探索建立同学会组织动力模型图,科学研判党和国家对同学会组织体系的下一步期待和要求。三是从新形势任务角度观察留学报国事业和留学人员事业发展态势,积极借鉴新的社会阶层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等业务领域创新举措,尝试从其他21家群团创新发展角度来横向审视各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四是建立总会组织与海内外各级各类组织的“大图”结构,不断优化同学会组织内部公务运转状态,构建更具普适性的内部管理规范制度体系,形成标准化公务模式和较为稳定的公务形态。五是强化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认识与实践,积极探索留学报国事业发展规律、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规律,干一番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事业,打造一支让党放心、精进工作、甘于奉献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者队伍,形成留学人员与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者关系相谐、留学人员与留学报国事业以及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者与留学人员事业同成长、共进步局面。

### (二)工作视角

一是密切关注党中央关于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密切关注留学人员组织在全球各地尤其是重点海外国家的发展状态,密切关注全国欧美同学会组织系统发挥作用的组织结构形态,准确把握组织体系“总分”结构的非隶属业务指导关系,引导地方组织与国别分会、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等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最大程度激发各级同学会组织活力,形成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大合力”。二是内涵化留学人员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内容框架。注重传承,不断凝练,内涵化新时代留学报国精神;注重创新,不断探索,努力夯实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基础。及时提炼“新时代留学报国精神”,让“爱国报国、创新强国”(暂拟)精神发扬光大;推动“智慧统战”“智慧留学人员统战工作”,伸展工作半径、增加工作要素,实现范围进一步扩大和要素重组的“链式反应”;注重在治国理政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动聚焦同学会组织助力“国家统战体系和统战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三是探索形成较为完整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方式方法体系。精准识别“异”、最大限度“同”,尤其在国内外不同场域以及“沟通党内外、联系体制内外、联络海内外”工作过程中坚持“有差别工作”法,尤其是在“有毒有害”环境中不忘“敌我意识”“忠诚意识”;探索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案例库建设,注重“过程”思想、紧跟形势,破除“一把尺子量到底”“一招鲜吃遍天”等形式主义错误观念。四是探索建立留学人员群体的大数据样本。对遍布海内外的广大留学人员及留学人员组织进行“人群画像”“组织画像”,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准确把握服务对象的数量规模、地域分布、家庭职业、专业领域、社会活动特征等基本情况,全景掌握,防止组织未识别、对象失联;重视留学人员中的特殊群体,比如:留学人员家庭(两代及以上均为留学归国人员),尤其是皆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外交人才、企业家等的留学人员家庭和“留二代”,跨国婚姻家庭及“双特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宗教信仰群体及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等叠加特征群体),动态掌握变化、跟踪分析变量,做到“看清脸、摸清底、把准脉。”五是探索形成与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智慧化相匹

配的精准分析框架。明确不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理论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沟通语言等的不同与界限,形成一系列适用不同场景、特色鲜明的话语系统;优化管理架构和业务架构配置,实现管理架构对业务架构的引领和服务价值,避免管理架构重配而导致失衡、造成业务架构的阻滞和破坏,避免“合署办公、分家干活”抵消合力;科学研判统战工作的社会化趋势,全面梳理工作事项,有效界定公务与服务,厘清党务、政务、会务、业务、事务、商务以及产业与事业之间的关系,辩证认识同学会组织产业、留学人员产业与留学报国事业、留学人员事业,专注“为党工作、强事业报国”的发展模式。

### (三)发展视角

从桥梁纽带和帮手作用角度看。一是思想引领——“思中思”。作为“第一服务”,紧紧抓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在加强理论武装的同时,贯穿到各项工作尤其是思想性、引领引导类、权益维护类工作中,真正做成“得人心、稳人心、赢人心”工作。二是建言献策——“策中策”。锚定科技、政策等方面留学人员专家学者对我国空白领域迈出第一步的开创性、有可能是里程碑意义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建言,做好建言资政工作。

从组织体系和职能定位交叉角度看。三是人才库——“库中库”。人才库是开展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核心资源,决定了“代表性”“覆盖性”留学人员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可同步筹划资料更加完善的高科技专家库、外交人员库、代表委员库、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库、各行业领域的骨干库、旅居海外人员库、在华外企人员库以及面向青年留学人员的后备人才库、中央和地方分级共享库等。四是智囊团——“团中团”。支持在国内外设“海外/中国研究中心”,支持学长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智库等任专家顾问,充分发挥“专家团”智力支持作用。五是生力军——“军中军”。凝聚党员学长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打造好这支绝对忠诚于党的留学人员铁军,发挥铁军作用;引导社会支持普惠服务老学长、女性学长群体,普遍化开展面向中青年学长群体工作和网络舆情工作;重视在外国政党政府及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任职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着力打造一支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助力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反间谍、反暴恐斗争和反“四独”工作的志愿专业队伍。

### 三、其他思考

除上述内部、工作和发展三个重要视角的考虑,在整体观、过程论视域下,留学人员的十项基础工作:档案、志鉴、博物馆、会史研究、工作理论研究、实体化“留学人员之家”建设、第三方评估、“一老一小”两个特殊年龄、法治化、推动国际化进程等,在即将走进新时代的第二个10年,应在各方面条件逐步具备时,梳理工作积累,通过相关机制,联合联动有关部门,投入必要时间精力切实开展有关工作,实现打基础、利长远、辅助战略发展等突破。

一是档案工作。当前,首要工作内容或可考虑抢救性整理老学长口述史,尤其是作为亲历者身份参与海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像音频文字资料;以档案数字化生成、档案利用与再加工、档案的数据化保存为基础,推动档案资料的成果转化;条件成熟时,根据密级、权限等要求,亦可借鉴其他工作系统做法,依托(共建)档案馆等实体平台的线上和线下渠道向会员、研究者等特定用户,提供有限开放查档服务。

二是志鉴工作。盛世修志,盛世伟业应入志鉴。秉承实录原则,存真求实,客观、全面、系统记述留学人员事业发展。志鉴编纂机构和方志人才均不可或缺。鉴于实际情况,当下或可与地方志编纂指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指组”)建立沟通协作机制,推动编纂《留学报国史(志)》《留学人员事业大事记》《留学人员统战工作年鉴》及各类专项志书工作,让海内外广大留学人员留学报国精神有新的记述载体、渠道和平台,进一步增强留学人员爱国底色、号召留学人员爱国报国,真正发挥出留学人员志鉴的“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三是博物馆工作。留学人员博物馆群是弘扬留学人员留学报国光荣传统、讲好“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爱国报国”故事、增强和提升欧美同学会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应积极探索建立与文博系统的沟通协作工作机制,并面向海内外征集欧美同学会各个时期尤其是会员参与重大活动的有价值的文字、照片、实物、音像资料等。坚决做好

妥善保存、适时展示国家领导人题字题词工作,逐步开展大力度搜寻不同历史时期学长的题字题词(含复制品)等有关工作,并依托专业力量,科学指导留学人员主题的地方博物馆建设,合理设置基本陈列,定期开展专题展览,纳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方阵体系。对于征集到的史料原件和物品原件,应进行文物等级认定,并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依托现有博物馆通过设置系列专题展览的形式,扩大受众群体范围和宣传覆盖面,巧用“文创周边”增强展览的亲力和可接受性和宣传效果。

四是会史研究工作。会史研究是学会组织的基础性工作,研究好“从哪里来”才能解决好“到哪里去”,可集合多领域专家、各国别会员或专委会成员等共同成立非实体会史研究机构,密切有关学术机构,创设会史研究学术年会,促进我会“专门史”在学科上出现更多硕士博士学位专业人才,以召开学术年会等形式逐步确定专家梯队,不断推进会史研究多出精品力作。另外,会史研究成果亦可加强转化与合作,与广播影视部门建立协作关系,高质量的广播影视作品尤其是公益性宣传片、传记性纪录片等亦非常可期。

五是工作理论研究。相对于党的留学人员工作尤其是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而言,工作机构的建制相对较晚,工作规律的探索和工作理论的建构还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范式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且聚焦新时代仍有大量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新实践有待总结归纳提炼,应积极争取创建出工作品牌,为丰富发展工作理论提供基本支持,创建新时代党的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理论体系。

六是实体化“留学人员之家”建设。在传承和弘扬留学报国光荣传统,号召广大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向老一辈学长留学报国精神和事迹的学习过程中,丰富新时代留学人员精神文明建设,内涵化“团结之家、温暖之家、奋斗之家”,注重“留学人员之家”的实体结构与功能建设;尝试在“学长之家”基础上拓展出符合广大留学人员迫切需要的新功能;设立“会所开放日”,探索网络与现实的双场景“留学人员之家”建设,既有方便联系的网上之家,也有方便走访、接受参观的实

体之家,既是思想阵地,又是情感家园;创建视觉形象统一标识体系,探索依托有关机构创设会员普惠服务型的“留学人员之家”分布式站点,拓展联络渠道、织密联系网络,争取创建服务品牌。

七是第三方评估工作。可针对基础条件、组织建设、内部治理、诚信建设、社会责任、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标准、阳光透明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等级评定,有计划开展有关机制运行效能评估、相关重大活动第三方评价,保障组织体系健康运转;科学制定考核指标与评价标准,探索创制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指标体系,适时将部分发展指标列为年度重点工作内容。

八是“一老一小”工作。百年欧美同学会,服务对象中一些老学长的会龄已经超过50年,或可请有关部门指导支持,向一生热爱并奉献留学报国事业的会员学长颁发“留学报国”“光荣在会50年”(暂定名)纪念章,号召老学长继续发挥作用,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针对低龄出国留学“小学长”的工作机制和政策方案。

九是法治化工作。探索推进留学人员统战工作法治化进程,先法制、后法治,可从倡导性法律规定入手,考虑制定《促进海内外留学人员报效国家、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条例》(暂定名),实现“依章治会”到“依法治会”的台阶式跨越;加强培育统战系统单位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功能,培养统战法律和统战政策专家形成专家梯队,争取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框架下研究制定出更多嵌入式配套的制度规范,营造法治化统战环境,积极助力统一战线法治化建设。

十是国际化进程。新时代留学人员统战工作要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号召海内外留学人员“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联合多元共存的力量、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积极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助力新时代外交工作和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挥留学人员主体和群体作用,打造好爱国报国、可堪大任的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队伍,助力大时代、大统战趋势下的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继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责任编辑:闫丽红



#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合建设

杨建平

**【摘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和合的本质是“包容开放”,要义在于辩证地处理了“异”与“同”“分”与“统”的关系。历史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取得大一统格局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族和合状态的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合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民族工作重要原则相契合,将助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不可破。此外,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合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行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和合 增进共同性 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埋头苦干、同心同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致思趋向。以和合理念开展民族工作,将助益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 一、和合的本质是包容开放

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和合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到,和合的本质是包容开放,要义在于辩证地处理了“异”与“同”“分”与“统”这两个普遍存在的关系,其逻辑进路包含如下三个层次:

首先,承认差异性,更强调共同性。既然是世界万物,那么,差异性的存在是绝对的,否则就不能称为“万物”,世界也失去了多姿多彩。因此,和合理念首先承认了万物间存在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就物体存在而言,“阴阳变化,一上一下”<sup>[1]</sup>,物体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点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就人的存在而言,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因环境的变化产生自身的差异性;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以内者父子兄

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sup>[2]</sup>,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之间,都有可能因为利益的纠纷而产生离散之心;就政道而言,“秦国失理,天下大败”<sup>[3]</sup>,统治者关注的是尽可能攫取财富以养尊处优,而百姓关心的是如何过好日子,统治者和百姓关注的焦点往往不一样;就“天-地”之分而言,“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sup>[4]</sup>,生成万物之气因形态相异而分为天、地,人处在天地之间。和合理念首先看到了世界万物的多变性、万物变化的多元性、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承认了差异性这一客观事实。

但是,存异只是一方面,世界多元性也必然决定了各元素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地方,和合理念更为强调共同性这一万物之间的联系。就物体的存在而言,物体自身的共同性使本体得以继续存在,保持常态;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必然导致人类的喜好、利益等有共同处,从而为人类合作共事提供可能;就政道而言,“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sup>[5]</sup>,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是统治者和百姓的共同需要;就“天-人”关系而言,“夫明白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sup>[6]</sup>,天人之间有共同的德性,人要遵守共同的德性,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在和合视域下,尽管世界万物复杂多变,但万物之间存在着共同性和普遍联系性,这种共同性和普遍联系性也为和合的深入发

作者简介:杨建平,男,贵州新发展理念与多党合作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

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互补互济、生生不息。既然万物之间存在着共同性和普遍联系性,那么在共通的地方实现互动合作就是万物自然的需要。在自然界中,这种互动合作表现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完美闭合的食物链循环,一生命体需要另一生命体供给才能生存下去,同时,此生命体又是其他生命体的供给方,各生命体间存在着自发的、无意识的互动合作。在人类社会,面对自然界的复杂多变,人类整体上就需要互动合作来抵御自然风险,同时,在人类社会内部,单个人、群体独占全部自然和社会资源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发展需要,人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sup>[7]</sup>。正是这种必需的互动合作从而使得人类获得了抵御自然风险并壮大自身的能力。

这种互补互济也成为世界万物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自然界各元素的互动合作使得各生命体成为整体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使得自然界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人类社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得彼此间能感受对方的伦理观念、情感态度、审美情趣、利益需求等,共同营造一种适合彼此生存并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氛围,进而被整合进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共情”能力不断增长,为成为共同的“我们”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实现和合状态,形成更高层面的共同体。在和合语境下,共同性基础上的不断互动合作最终产生共生的效果。和合双方经过不断地调和、互动和适应,最终成为更高层面的共同体。这表现在,对于人自身而言,“知”与“行”合一,内心与外在经过不断地调适,最终达到孔子形容的“从心所欲,不逾矩”<sup>[8]</sup>的境界,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君子和而不同”<sup>[9]</sup>的和美之境。对于客观世界而言,客体经过组合整合,形成更高层面的有机整体。比如说,宫、商、角、徵、羽不同的音调组成一部优美的完整的音律。对于“天-人”关系而言,天人的共生造就了一个天、德、礼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人要根据天的意志,顺天而宜人,敬天而礼人,不失天道也不失人道,至此形成天人合一的境地。

从本质上看,这一和合状态,并不是对各元素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各元素之间的机械同化,而是在保留各元素个性的同时,促使各元素成为更高层面的一体。这一过程同样也不是元素间的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元素间的有机整合,是一种存有互动合作的双方经调试产生新的共同体的过程。这个共

同体超越了原有的个体的存在范畴,是一种本质属性的变化。

总之,和合的本质是包容开放,要义在于存异求同,存分求统。作为行动指南,指向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合作;作为状态,本质表现是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的形成。作为中国文化的元认知理论,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关系的处理上,从而有力支撑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相互合作交流中日益深化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和合而成

费孝通先生曾精妙地描述了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sup>[10]</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行了演绎和深化,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sup>[11]</sup>;“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sup>[12]</sup>这就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合形成过程——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在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尽管存有地理分布、文化程度、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但是半封闭型生存空间和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预设了中国古代民族间的互通性

就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而言,两者存在着地理位置、文化位置和政治位置上的差异。在地理位置上,汉族居于天下“五服”的甸服、侯服和宾服,坐拥中原这一自然条件相对优渥的区域,少数民族处于“五服”中的最外服——要服、荒服,位置最偏,生活区域多为荒漠、山谷等地貌。在文化位置上,因边疆少数民族披发左衽、衣羽毛穴居等特点,儒家文化将其视为“蛮夷戎狄”。在政治位置上,朝贡实际上是边疆少数民族对皇帝的尊严默许的一种表征,因而在赏赐和进贡的仪节上,则必须充分体现出天恩高厚与俯首听命之间关系的无可置疑性。

但是,这种差异性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也不妨碍中国古代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和共同性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半封闭型的生存空间预设了中国古代民族间的联系,并随着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这种联系愈发频繁和密切,使得中原汉族与

边疆少数民族共同性不断增长。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生存区域,是一个四周为自然屏障、内部却地域相连的地理空间,形成一个自成结构体系的地理单元。在这样的地理单元下,汉族要先开发适宜农业种植的黄河流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工具的革新,逐步开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对于生活在四周的少数民族而言,周边自然屏障的存在决定了少数民族进一步向外发展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通过互市贸易、朝贡赏赐、战争掠夺等多种途径从中原地区获取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弥补自身经济的不足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占据中原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之地的汉族,有着强大的文化辐射作用和经济的带动作用,促使中华各民族间互通性大为增强。其一,汉族通过文化的辐射作用向周边各族传递文化,周边各族也以各种形式将自己的文化反馈到华夏文明之中,交流不断。其二,汉族坐拥农耕经济之便利,随着汉族生活区域的不断扩大和同周边民族的不断交流,汉族的种植、冶铁、织布、制陶等技术不断传入周边地区,周边少数民族的各种物资也进入中原地区,两者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

这样,尽管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间存在着种种区别,但是这种差异性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半封闭型生存空间的地理单元中,随着作为凝聚核心汉族的逐渐形成,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长,这就为中华民族的和合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

在古代中国的统一时期,政治上的统一确保了王朝版图内各民族交流合作的顺利开展,在古代中国的分裂时期,因战乱、避灾导致的各民族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间、边疆民族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

以匈奴为例说明这一点。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崛起于我国的北方。秦朝时,派蒙恬“北击胡”,收复河套地区。此后匈奴屡次侵扰汉族居民,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使匈奴远遁。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奉行与汉朝和好政策,北匈奴继续反抗汉朝廷。南北匈奴分裂,各为扩大势力、争夺地盘,加速了匈奴族的衰落和解体。三国以后的南匈奴,主要居住在今山西省境内,由于曹魏的控制,其部族组织还存在,但事实上南匈奴已亡。然而,匈奴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实体,仍

延续很长时间,他们在与各族统治阶级的角逐中,除南匈奴外,又形成了西北沿边地区的屠各胡、张掖一带的卢水胡和铁弗匈奴。在两晋时期,屠各胡与南匈奴以今山西省为中心建立了汉和前赵政权(304-329年),卢水胡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建立了北凉政权(401-439年),铁弗匈奴在河套地区建立了夏国(407-431年)。南北朝以后,匈奴作为一个社会实体,遂不见于史。骁勇善战的匈奴从历史上消失,是由于其不断迁徙,与各族杂居,融合到其他民族。其主要去向为:首先,入居“塞内”的匈奴,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成为汉族的一部分。第二,相当一部分匈奴人加入了鲜卑族。“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sup>[12]</sup>。也就是说,很多匈奴人加入了鲜卑,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第三,继续留在塞外的匈奴人,在匈奴溃散后,又凝聚为新的共同体。《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这就是说,匈奴成为回纥族的祖先。第四,西迁的匈奴人,皆加入了西域诸族。匈奴族的经历并不是个例,突厥族、回纥族、沙陀、吐蕃族、党项、契丹等民族都有这样的类似经历,或者与汉族自然同化,或者融合到其他民族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sup>[13]</sup>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统一或分裂,各民族“汉化”与“胡化”双向互动,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

## (三)中华民族的形成、大一统格局的形塑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族和合状态的实现

在半封闭型空间和凝聚核心汉族的共同作用下,各民族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也共同形塑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格局。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是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sup>[14]</sup>。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混合性特征,成为相对于各民族单元处在更高层次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成为一种成分丰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共有文化。各民族“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sup>[15]</sup>最终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线,在民族关系上的鲜明

体现是“华夷同源”和“华夷一体”。汉族(先民)和诸多少数民族(先民)共同把黄帝、炎帝等认为是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华夷同源思想。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人将自己视为夏后氏也就是大禹的后代。同理,在如今我国山东省一带建立南燕政权(公元398-410年)的鲜卑人慕容德,认为自己是轩辕之苗裔。这样,各民族经选择、修改、妥协而形成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以凝聚彼此。在这种历史书写中,华夷都是中华先祖的后人,华夷都被串联到以炎黄、盘古、轩辕、女娲等为先祖的“年表”里,成为中华先祖“族谱”中的一员。王朝统治者对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一视同仁,这就是“华夷一体”思想。在天下之主看来,要不断推行王者之政、礼仪之化完成华夷一体、礼教四方的大一统格局。如,满族政权就秉持“华夷一体”的观念,通过大力宣扬儒家文化、设立理藩院、联姻蒙古族、尊崇藏传佛教等一系列手段,完成了“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sup>[13]</sup>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sup>[14]</sup>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并取得“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中国古代民族和合状态的最佳注解。

### 三、和合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相契合

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sup>[14]</sup>。和合的本质是包容开放,要义在于存异求同、存分求统,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重要原则相契合,将助益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不可破。

(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政治环境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兼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差异性的基础上,体现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安排。“民族合作”“共同发展”,深化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载的重要国家使命。这一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的制度既是对中国传统“羁縻”制度和因俗而治习惯的学习和承继,也是当时具体社会环境决

定下的最佳政策选择,集中体现了既承认差异性又强调共同性的和合特征。

看待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异”与“同”、“分”与“统”时,就要看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有特殊性,但和其他行政区划一样,都是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一片区域,是各族同胞共有的一块地方;自治机关具有变通处置权,但不得违背上级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存有被冠名与否的区别,但是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sup>[10]</sup>

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sup>[15]</sup>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十二个必须”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sup>[14]</sup>这都能看出,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政治环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政治的关键是要“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同时针对“三个特殊”(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继续制定和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以推动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相结合。

1.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经济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升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使各族群众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夯实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

看待各民族经济发展上的“异”与“同”、“分”与“统”,要看到,民族地区集“六区”于一身,而且受历史、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一轮期待是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统。

面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经济环境既要做好“输血”工作,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强化帮扶举措,完善帮扶机制,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实施好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

行动等规划;更需要民族地区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发展格局,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发展,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越来越多的社会空间成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场所,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间共同性的增长有了更适宜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将这一民族间的交往模式总结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看待各民族的社会交往层面的“异”与“同”、“分”与“统”,就要看到,民族身份有“分”,但公民身份是“统”,民族身份要服从于公民身份;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但是学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各族公民的责任;各族群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有差异,但都要接受共同的社会规则、法律制度的约束,同时要向现代化迈进。

这就要求在尊重各民族差异性但不是强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在尊重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同时,全面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阂;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事件,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同时,唱响互联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舆论主旋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文化环境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园,是对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既有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内容,也有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内容。从2014年的“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到2021年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文化认同具有更深远和厚重的力量,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才能推动各族群众形成破除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合力,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构建各民族和合发展的文化环境,就要看到,各民族文化是形态不一的枝叶,但中华文化是众多枝叶得以生发的主干;各族群众有自己的民族归属,但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群众在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方面有差异,但都要向现代化迈进;各族群众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增进“五个认同”是各族群众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新时代新征程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充分尊重各族群众在宗教信仰、饮食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引导各族群众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机性;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用各族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做细、做实,促使所有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传导,使得民族成员在拥有个体层面充分发展权利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 四、余论

“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是文明的生活之必需,也是人结合于社会之必需……同一国家内的多民族的并存,既是其自由的检验,也是其自由的最好保障。”<sup>[16]</sup>在现代主权国家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的既成事实下,如何保障国家内多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是对一国自由程度的衡量。同时,多民族和谐共处目标的达成也是国家这一政治体成为真正自由之体的保障。历史已经证明,民族之间的杀戮、战争只会带来长久的仇恨和更大规模的循环性杀戮和战争。各民族间融合的深化,只能是一个长期而温和的涵化过程,它需要各族人民持久和坚韧的共同努力,而且最终的理想也不应是消除各民族的个性,而是在保持和发扬其各自优美特性的同时,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共同性。

如果将“同”理解为同质,那么就会犯下强制同化的错误。西方历史上屡屡出现的种族灭绝、屠杀宗教异见者等就是这种强制同化的体现。前苏联曾自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人为地抹杀民族特点,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这也是将“同”理解为“同质化”的体现。而如果只看到“异”和“分”,不强调民族 (下转第74页)

# 统一战线对中华“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王 凯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形成于近代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和解放斗争中,是对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政治中法儒二家的智慧精髓——“大一统”与“民本”,通过“统一战线”统筹于现代政治“秩序”与“民主”两大核心价值的实现中,“和”是民主,“合”是秩序。“秩序”与“民主”两大价值的平衡发展,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和合”思维,也从制度上实践了现代政治学国家建构理论,纠正了西方民主的价值困境。

**【关键词】**和合文化 统一战线 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共产主义理想与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俗伦理、民本思想、实用理性高度一致,内在融通。中国共产党既是坚持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也是具有“家国情怀”和“君子良知”的士人集体。这是其百年创业能够取得成功的价值基础和文化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法宝”,不仅仅因为它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更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和合”观念的融合,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统一战线虽源于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同盟军理论,但其在中国的实践已远远超过了革命之术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执政之道、治理之道、发展之道,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文拟从和合文化入手,结合西方政治学观点探讨民主与秩序及其平衡性问题,进而总结统一战

线的深刻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追求。

## 一、中华文化中的“和合”观念

文化,原意是“以人文化天下”,即用核心价值观教化社会。《易经》贲卦象辞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的祖先智慧地感悟天道并发展出人道,运用了“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形成具有自然哲学意义和实用理性精神的中华“文化”,因此,中华文化又被称作“天人合一”的文化。人的聚合和互动形成社会,社会的组织、分工、运转离不开政治。古人把社会政治的运动变化规律归纳为“政道”。那么,“政道”的本质价值是什么呢?答案是“和”,或者是“和合”。

面对世界多样性带来的各种矛盾,人类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观念、用斗争方式进行单一向度的同化。二是用“和”的观念和“执两用中”的方法,达成“求同存异,安定团结,互相借鉴”的“和为贵”境界。后一种是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普遍是一种政治思想,突出表现为在东周那个天下分裂、政治颓坏、战乱频仍的“礼崩乐坏”时代,知识分子渴望实现“乱中求治”、“分中求统”、“天下定于一”的政治关怀。“和”是儒、道、法、

**作者简介:**王凯,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墨等多家普遍认同的政治主张。

首先,“和”代表“生”的根本力量。《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并不是一致无二,而是“二而一”的对立统一关系。易经用阴阳二爻诠释“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多样性的存在、发展和变化。《老子》用“有和无”、“无中生有”塑造了中华的源头哲学。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因此,只有多样性,才能带来“生”。“和”代表“生”的根本力量。

其次,“和”代表“生”的理想状态。生的理想状态是“合”。管子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辑以悉,莫之能伤”。《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合文化”<sup>[1]</sup>。“合”是从“和”派生出的概念,是“和”的价值所在。“和”带来的是和谐、合作而非排斥、争斗。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论语·子路)。只有不同思想的碰撞才能形成火花,小人无原则的盲目认同和跟随自古就不符合“君子”的“仁”。孔子是直接讲政治的,他显而易见的提出其政治主张,即“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孔子理想中要恢复的政治制度和秩序,其核心是“和”。张岱年曾说,“‘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sup>[2]</sup>。

第三,“和”代表“生”的运行方式。这里的“和”更具动词属性,意味调和、平和、配合。《老子》中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王弼注:“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吴澄(元代经学家)注:“和,犹平也,掩抑之意;同,谓齐等而与之不异也”。古人看来,“和”是智慧者所拥有的为人处世之法。《老子》曰,“音声相和”,既指乐器与人声的相互掩映,又指旋律与和声的相互配合,甚至可以理解为心与耳的内在统一。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和”作为基础价值的忠恕之道。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觉察了“自我与他者”二元性所包含的巨大坎

陷,注意用辩证和联系的观点加以分析,用强大理性试对其加以弥合,企图破除人己之限隔,构造“他人不在自我之外”之论,如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和合”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也揭示了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基本运行方式。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种独特智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尚书》),一种蕴含着整体性、发展性、包容性的世界观塑造了中华文明崇尚和谐、反对奴役和压迫的政治价值观。易经提出“太和”,即“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认为万物皆能和,皆须相和,本性相和,这是对万物运作认知的最高境界。钱穆认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sup>[3]</sup>

## 二、和合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哲学是文化的精神基础,也是推动政治发展、塑造政治制度的源动力。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和合”观念不但构建了“敬德保民”、“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也推动政治制度从早期的“家天下”向“郡县制”等维护“大一统”的路径演变。

周武王灭商后,其弟周公旦为了巩固新生的西周政权,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基于“和”文化的制度,如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在政治上实行分邦建国、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并提出“敬德保民”的先进思想,成为之后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其目的就是巩固“家天下”大格局、统一人心,防止叛乱,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制度维持了西周400多年的长期和平。东周以后,诸侯实力不断增强,周天子式微,原来的政治血缘关系也变得极为淡薄,由此天下大变,政治失序。经过近五百年“五霸强,七雄出”的春秋战国之乱后,最终以“秦并天下”,即秦国重新建立政治秩序而结束。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期间诸子百家思想的勃兴,实则是对“和合”观念经世致用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法家人物。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



败》一书中提出一种政治三维论,认为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sup>④</sup>。“国家建构”应是首要前提。福山引用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诸多文明中最先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文明,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制度”。儒家虽法家都高度主张类似“国家建构”的“政治秩序”重建,但在寻求路径上,儒家“往回看”,法家“向前看”,孔子和孟子用尚古精神和道德仁义来游说列国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布道,但没有认识到平定政治、由乱向治是一个不得不需要强力手段的过程,如墨家所言“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和”虽是道,但并不能自然的导致万物“合”的结果,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人性本恶”,已经标志或预示着用“铁血手段”来恢复秩序的思想转向。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等法家人物通过辅佐秦国,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严刑峻法,推动富国强兵并最终“一统天下”从而在行动上完成了对儒家的“批判”,这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然而,秦朝的“短命”又引发了对“法家”的一轮批判,至董仲舒“独尊儒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正式形成。用福山的逻辑分析,政治秩序虽然可以先于民主,也可以用铁血的手段来实现,但秩序达成后必须要推行民主,要防止政府私利化和“政治衰败”,这才能带来政治的良性发展。福山把政府被宗派、利益集团、家族等绑架叫做“依附主义”,认为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古代中国,虽无现代意义的“民主”,但却有与之内涵相通的“民本”。“稳定”与“民心”构成历史往复循环的某种“二律背反”。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期”往往都是政治秩序有保证,同时统治者注重开放,愿意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儒法两种文化较为平衡的时期。而秦、隋、元等短命朝代显然是法胜于儒,表现出专制、暴戾,导致人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而长周期朝代末期的乱局则是因为“民本”式微,代表民本发声的儒家知识分子缺位,无法有效改革导致积重难返而陷入政治衰败,最终发生政治失序。古代一系列进步的政治思想与制度创建,如“科举制”、“言谏制度”、“协商议事”、“三省六部”、“巡察”等乃至更细的“中书舍人”、“给

事中”、“五花判事”等都体现了民本观念下对君权的限制与纠错,虽然其作用有限,但其历史作用也不容抹煞。历史反复证明,文化的碰撞融合不断造就历史的进步,诸子百家思想的碰撞造就了秦汉的伟业,魏晋南北朝的胡汉文化融合形成了大唐的光辉。“和合”带来生机,儒法两种思想的相生、相争、相容、相互依赖本质上是“和”文化的一枝独秀,或者说,是“和文化”在应用道路上的不断调适,阴阳两级的此消彼长。

### 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和合文化的继承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充分展现了其不仅是坚持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更是具有“家国情怀”、“君子良知”,秉承着中华文化“道统”精神的士人集体。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三者进行创造性融合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

统一战线形成于近代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和解放斗争中,其思想来源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主思想、结盟理论、革命理论等,也包括西方民主理论、政党理论,更来自于中华传统的“和合”观念和“大一统”思想。“和合”文化是统一战线的核心文化。“和合”用现代政治学语言讲明,是“政治秩序与民主民本的平衡发展”。“合”体现秩序,“和”体现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统一战线“同心圆”思想,指出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圆心半径是同心圆的必要因素。圆心要保证其唯一性,那就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地位,蕴含着大一统的价值追求;半径则体现着共同的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容合作、民主监督等内涵。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国家道理”与“三大法宝之一”,要义就在于其兼顾了秩序与民主,使这两种核心价值平衡发展。这种智慧不仅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与共产主义运动逻辑基础上智慧创造的统一战线方针,是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实现伟大复兴而诞生且不断发展的“人间正道”。



“秩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首要功业。近代中国以政治失序和社会一盘散沙为最大历史教训。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sup>[5]</sup>亨廷顿通过对二战以来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总体研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除了个别少数(如中国),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是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稳定的顽症,就在于政府在民众呼声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下,过渡开放政治参与而忽视政治秩序,最终损害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sup>[6]</sup>。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历史工业就是把“四万万如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改变,把中华民族有机地组织起来,完成了“聚沙成塔”。因此,统一战线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构建和谐稳定有序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为责任,把政治秩序作为最大的公共价值。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1945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的“窑洞对”中,阐释了中共要把“民主”作为领导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方针,也预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到来。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和“人的全面解放”的问题,其本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列宁指出:“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sup>[7]</sup>在抗日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三三制”政权,把“协商”作为发扬民主、巩固政权、扩大同盟、科学决策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sup>[8]</sup>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广大党外民主人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思考中国应实行的政党制度时,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sup>[9]</sup>

人民民主观念来自民本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曾指出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都正如《老子》所揭示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也如古语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中将一切共同体建立的目标定义为“某种善业”,认为“善即是公正,就是共同利益”<sup>[10]</sup>。可见,执政集团的去私利化和国家利益观是实现其长期执政的根本。弗朗西斯·福山把政府的私利化称作“依附主义”,认为是政治衰败的开始,这是古代中国治乱循环的主要内因,也是今天西方之乱的源头。统一战线强调人民民主和共识团结,目的就在于消解各种私利化趋向,匡正民主的价值,真正实现民主及其制度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什么集团和精英为中心。

民主以秩序为前提。统一战线以实现“民主”为责任,但“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不是精英的民主,必须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以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为方针。2018年3月习近平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的重要功能,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民主党派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参与国家治理,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体现了民主监督的协商性、合作性以及主客体使命目标的共识性。2016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提出:“希望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发挥好民主监督职能,

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sup>①</sup>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各对象,参政党等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等都可以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港澳台同胞和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可以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共建“一带一路”的事业中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与祖国共谋发展;民族、宗教的代表人士可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发挥宗教社会正能量中积极作为。如果把中国的成功与苏联的解体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苏联解体的文化根源在于苏联共产党一方面背离了马克思的同盟军思想,另一方面自身文明传统缺少如中国文化“和合”的基因而无法对其民主政治进行发展和超越,从而丧失执政基础。

新型政党制度是统一战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结晶,浸透着和合文化的精髓,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新型政党制度以国家治理而不是小集团利益为根本导向,为政党政治的区域适应性和文化本土性提供了有益模板。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是对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统一战线将中国古代政治法儒二家的智慧精髓——“大一统”与“民本”,统筹于现代政治“秩序”与“民主”两大核心价值的实现中。价值维度中,利用民本的传统将民主明确定位为“人民民主”,“和”代表人民民主,“合”代表政治秩序。“秩序”与“民主”两大价值的平衡发展,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和合”思维,也从制度上实践了现代政治学国家建构理论,纠正了西方民主的价值困

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 [2] 张岱年.《漫谈和合》,社会科学研究,1997(05)
-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162
- [4]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1
- [5]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
- [6]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
- [7]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3.
-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
- [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 [10] 亚里士多德.陈虹秀(译).政治学[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2,117.
- [11] 习近平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海外版)[N].2016年10月29日第1版.

责任编辑:王昊

# 黄河文化的优秀特质及现代转化

刘树升

**【摘要】**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黄河文化蕴含的道德伦理色彩、和合大同价值观、家国天下情怀、民为邦本理念、“大一统”思想等诸多优秀特质,是中华文明血脉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壮大的基因密码,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保卫、开发、治理黄河的伟大实践,为黄河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生机。新时代黄河国家战略的提出,既对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要求,也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关键词】**黄河文化 优秀特质 中国共产党 现代转化 化两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了黄河保护与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求,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sup>[1]</sup>言简意赅的几句话,既指出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又对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要求。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讨黄河文化的优秀特质及其现代转化,以期对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增添助力。

## 一、黄河及黄河文化总体概述

人类文明起源与大江大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人类四大早期文明为例,古巴比伦文明诞生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埃及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古印度文明诞生于印度河、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则诞生于黄河和长江流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非常适宜

人类的生存进化和文化的积累发展。从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灿烂辉煌的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生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何为黄河文化?当前关于黄河文化的概念界定较多,尚无定论,笔者较为认同徐吉军的观点:“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sup>[2]</sup>黄河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哲学、艺术、历史、教育等诸多方面,并且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高水平的文化复合体。

黄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具有从多元到一体的特点,这在其文化区域的划分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黄河蜿蜒五千多公里,黄河文化诞生发展一万余年,在广袤的黄河流域中逐渐形成了三秦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河湟文化等发达的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在历史上交相辉映、彼此融合,造就了多元一体、厚重恢宏的黄河文化,也使

作者简介:刘树升,男,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刊图书资料部编辑。

得黄河流域在历史上有三千余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时至今日,这些区域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特色,并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生活中。

## 二、黄河文化的优秀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sup>[3]</sup>黄河文化“最早把中国推进到文明时代,最早孕育出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的统一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在数千年间文化统绪绵延不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系统”<sup>[4]</sup>。黄河文化的诸多特质,是中华文明血脉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壮大的基因密码,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 (一) 道德伦理色彩

黄河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在古代黄河流域,为了发展农业经济,需要借助道德伦理构建和维系稳定的社会组织共同体,因此黄河文化具有高度的道德伦理色彩,是一种德性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衍生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等道德纲目,推崇以祭祀、孝道等为主要内容的礼教,重视宗法关系,强调道德正义、责任意识和集体主义。从长远来看,黄河文化的道德伦理性对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稳定和民族血脉延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是黄河文化能成为正统文化、被历代统治者认同和推广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黄河文化能称为一种文明形态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黄河文化对道德伦理的高度重视,使得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符合历史发展的正义性,从而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苦难而不涣散,反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 (二) 和合大同价值观

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系统,其本身就是综合三晋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以及夏、夷、狄、羌等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形成了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观。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黄河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在经历外来文化冲击时,能以博大的胸怀不断吸收消化、取长补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包容性和同化力是历史上世界其他几大古

老文明所不能比拟的,保证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完成,避免了中华文明的僵化衰亡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瓦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文化经典《礼记》中对“大同”社会的这段描述,是中华文化先进性、正义性的最佳诠释,使得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有着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始终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近代中国面临空前危机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民族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先进理论的指引,有了伟大信仰的支撑,中华民族再次得以新生。

### (三) 家国天下情怀

先民们在与黄河水患的斗争中,在人力物力的统筹协调中,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继而形成了强烈的家国情怀。《礼记·大传》中对家国一体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从“亲亲”这一人性出发,通过祭祀等仪式将个人、家庭、家族、国家连接成一个共同体。“在这样一种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的人际关系序列中,家庭高于个人、家族高于家庭、国家高于家族,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的群体主义文化”<sup>[5]</sup>。

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这一黄河文化主体的重要特质。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理路,家国天下一体的理念被一代又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践行,使得报国为民的理想信念、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不断升华。儒家对社会大众道德教化和知识普及的重视,也使得“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典故千古流传,家国情怀因

而融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国家至上、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精神”<sup>[6]</sup>,即以爱国主义为标志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战胜历史上无数次危机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支撑。

#### (四)民为邦本理念

“民为邦本”理念在西周时期已经成熟,表现为“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是西周统治者鉴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夏商两国覆亡的教训而得出的。其实,这一理念有更悠久的历史,甚至是黄河文明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无论是城市、国家的产生、文字的萌芽与形成,都是为了人类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在起源之时就具有突出的人本性。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他带领百姓植桑养蚕、种五谷、养家畜、制作石器陶器等传说,在黄河文化的源头上就埋下了重农爱民的种子。《黄帝四经·十六经》中黄帝的一段话正是最好的注解:“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无命,执虚信。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吾受民命于天,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

经过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贾谊、唐太宗、朱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述和践行,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不断成熟完善。<sup>[7]</sup>作为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特质之一,民为邦本理念被历史上大多数英明统治者所认可和奉行,他们对人民利益的维护,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自身的统治,但无可讳言,客观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的重要作用。

#### (五)“大一统”传统

“大一统”思想是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理念的重要渊源,“大一统”国家形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大一统”的发展与黄河的开发治理关系密切。

如前所述,世界四大文明都是依大河而形成,中华文明也是如此。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遗址,如距今75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已经炭化了的粟类粮食作物和石斧、石刀等生产工具,证明那时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

农业经济。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统一王朝夏、商、周,统治范围都是在黄河流域,国都虽然频繁迁移,但都是沿黄河而建,根本原因就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发展离不开黄河。对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经济来说,水利灌溉事业是命脉,“而水利设施的修建,水患的治理,都不是任何一个氏族部落、更不是单个的小农家庭所能胜任的。因此,这种经济的特点,共同的生存利益,治水斗争,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sup>[8]</sup>“也要求形成集中的社会权力,从而提出国家产生的客观要求。”<sup>[9]</sup>从而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民众心理基础和社会组织形态基础。大禹治水成功后,从夏后氏部族的首领进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的君主,正是历史大势所趋。从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到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再到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最终形成与确立,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和理念不断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就是黄河治理对中央集权联合体的需要。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治中心,尤其是长安、洛阳、咸阳、开封、北京等“古都”都在黄河流域,证明了黄河对“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性。当然,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汉字,由于其“超方言”特性,避免了各地人民在语言、文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化,也对我国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乃至“大一统”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此外,黄河文化中蕴含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勤劳务实、团结一致等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至今的重要内在支撑。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黄河文化的现代转化

黄河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原始发展时期(原始社会晚期)、独立文化系统的形成时期(夏商周三代)、鼎盛时期(从春秋战国至宋代)、迟滞与衰落时期(从元至清)、挑战与再生时期(鸦片战争至今)。<sup>[9]</sup>黄河文化的发展基本是与中华民族同步的,对此学术界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成果。本文侧重通过梳理近现代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集中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黄河文化的现代转化。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保卫黄河

近现代的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以黄河文化

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国人多丧失了文化自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华文化仍在探索新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历程中,形成了伟大的革命文化,给包括黄河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华儿女保卫黄河的近现代历史中,黄河文化也得以新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的国土从东三省扩展到华北地区,他们甚至叫嚣以三个月时间“灭亡中国”。在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实现全民族抗战才是唯一出路。1936年,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这个中国历史上十多个王朝建都的古老城市,也再次与黄河一起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新巩固,见证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形成。

近现代黄河文化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和广泛传唱。1939年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在延安诞生的《黄河大合唱》,由七种不同演唱形式的歌曲构成,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控诉侵略者的残暴,并展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奋勇斗争的英勇场面,勾画出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顽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崇高”“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

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等朗诵词和歌词,体现了黄河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再次通过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精神图腾,凝聚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伟力。

研究近现代黄河文化的发展,尤其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的巨大推动作用。2021年9月29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第一批精神谱系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精神,大都形成于广大的黄河流域,是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为黄河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治黄文化

“黄河宁,天下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黄河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它既提供了生存发展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屏障,也因其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而给沿河人民带来了长期的忧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历朝历代都将治理黄河作为兴邦安民的大事,黄河安澜的时代也多是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大禹治水、汉武帝“瓠子堵口”、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柱子上等传说和历史典故都证明了这一点。对黄河的治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担当意识、团结意识和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撑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内容。

黄河屡治屡决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sup>[10]</sup>。在治理开发黄河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黄河文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决维护沿黄区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继承和发展了黄河文化的民本思想;广泛吸收借鉴历代治河方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兴修

水利工程,进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实现黄河安澜,继承和发展了黄河文化的科学精神;带领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拼搏进取,精诚团结,同洪涝、干旱、污染、水土流失等进行坚决斗争,继承和发展了黄河文化的斗争精神和团结意识;面对黄河水资源紧缺和污染日益加重等问题,党开始在治理和开发的同时,更加重视对黄河的保护工作,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黄新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黄河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的伟大实践,在为黄河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其坚定的人民立场以及强大的社会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

### (三)抓住黄河国家战略契机,推动黄河文化“两创”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仍然存在的洪水风险、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为民心切,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了黄河治理与开发的新时代,也证明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密切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求,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对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要求。当前,需要抓住黄河国家战略契机,坚持系统思维,将推动黄河文化“两创”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大对黄河文化内涵和特质的研究宣传,尤其是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发挥两者对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促进作用,以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二是大力扶持创作彰显新时代面貌气象的文学、音乐、影视等领域的黄河文化精品,讲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时代“黄河故事”,提炼形成更多更富时代性的黄河文化符号,增强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传播力、感染力。三是坚持高标准规划,持续性打造彰显黄河文化精神的文创产品和文化活动,并推动黄河文化与红色文化、姓氏文化、汉字文化等融合发展,形成平

台效应、融合效应。四是推进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系统保护,这既需要沿黄各地区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也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以真正保护传承好独一无二的黄河文化。五是在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充分挖掘黄河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以文促旅、以旅促文,扩大新时代黄河文化受众面和普及度,为黄河文化“两创”提供物质基础,注入强劲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韩正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0(01).
- [2] 徐吉军.论黄河文化的概念与黄河文化区的划分【J】.浙江学刊,1999(06):134.
- [3]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韩正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0(01).
- [4] 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J】.史学月刊,1997(06):77.
- [5] 张践. 儒道互补建构了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世界【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2):77.
- [6] 张践. 儒道互补建构了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世界【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2):77.
- [7] 汤荣光,李嘉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意蕴及其调试【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1):79.
- [8] 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J】.史学月刊,1997(06):78-79.
- [9] 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J】.史学月刊,1997(06):80-84.
- [10] 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韩正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0(01).

责任编辑:常海哲

# 武威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毛秀花

**【摘要】**甘肃武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融合发展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and 区位优势。近些年,武威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围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大量实践与探索,切实奏响了文旅同频发展的时代旋律。本文以武威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为切入点,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当前该区域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进行了研析,并据实提出推动武威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提供可借鉴思维启迪。

**【关键词】** 产业发展 路径

武威作为中国旅游标志之都、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区域地位优越,具有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武威市紧紧围绕建设文化旅游名市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升文化旅游要素品质,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全力打造“5+N”文化旅游产业链,着力构建要素齐全、产业互通、优势聚集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扎实推动文旅产业挖潜增效,持续做大做强做优文旅产业,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呈现“稳健高效”的良好态势。

## 一、武威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概述

### (一)公共设施日趋完善

武威雷台文化旅游综合体打造集遗址保护、历史教育、旅游休闲、文创基地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型5A级城市中央文化观光景区,深度挖掘宣传五凉文化、天马文化、葡萄酒文化、凉州词文化等核心价值,加速升级产业空间维度,推动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链,全力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雷台文化旅游综合体、历史文化街区、苏武沙漠景区加快建设,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体育馆、天马剧院、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古浪战役纪念馆扩建工程、八步沙“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天祝冰沟河、五凉文化博物馆、李铭汉故居等重大文旅项目建成投运。

### (二)扶持政策相继出台

以提升文旅效能为目标,着力提升文旅要素供给水平,针对引进高素能培育骨干链主、塑造与加大

品牌宣传、激励文旅行业创新消费等依规制定了系列扶持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资金的政策导向鼓励扶持作用。比如:2018年制定出台《武威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关于加快文化旅游名市建设的意见》,提出40条和21条极具含金量的政策措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从2016年的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

### (三)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突出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精品旅游线路打造、文旅业态创新、品牌营销推介等重点,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效,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撑,加快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进度。立足区域实际和游客需求,着眼武威市文旅市场长远发展,为不断提升文旅市场标准化建设水平,制定实施《武威市“十四五”文体广电旅游发展规划》,构建“一核五星三带四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形成了历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民俗风情游、乡村休闲游、科普研学游、红色旅游6类19条旅游精品线路,打出了“天马行空·自在武威”的旅游品牌。

## 二、武威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面对全国全省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竞相发展的态势,相对于富集的资源 and 培育打造支柱产业的要求,当前武威市文化旅游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需要逐步解决的不足和短板。

### (一)核心景区引爆作用尚没有发挥

尽管已经实施了雷台文化旅游综合体、历史文

作者简介:毛秀花,女,中共武威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化街区保护建设等一批重大文旅项目打造,但目前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旅游产品极少,旅游景区点多、线长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二)文化旅游市场培育不足

区域内景点资源挖掘不够,特别是餐饮、娱乐、纪念等衍生产品特色不凸显,文旅产业主体“小、散、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同质化、低端化明显。

#### (三)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改进

旅游景区硬件设施建设不断进步,但部分景区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等软件方面相对偏低,导致景区功能质量不高,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游客量增大时,无法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配套旅游服务。如:武威没有机场,高铁尚未开通,旅游大交通瓶颈制约问题依然存在;景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如通往天梯山、冰沟河景区道路等级低、可进入性差;全市还没有一家五星级宾馆和5A级景区。

#### (四)文旅人才短缺

随着文旅产业迅速发展态势,武威市文旅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无论从人才队伍总量、结构、素能,还是从后续培训提升体系建设、培育与引进机制制定、激励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滞后现象。文化旅游从业人员存在素质偏低,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特别是创意设计、旅游规划、经营管理、宣传营销等方面的人才紧缺,景区导游讲解员青黄不接、新鲜血液少。

### 三、武威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一)出台扶持政策,助推文旅提质增效

1.推出提振措施。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扶持奖励文旅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制定实施《武威市文化旅游产业链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编制《天梯山生态文化景区总体规划》,加快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凉州十七巷开园运营,建成汉唐天马城、文庙儒学院,开工建设凉州会盟纪念地项目,加快推进天梯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引资筹建市游泳馆,整合资源迁建市体校,策划包装武威沙世界、房车露营地等一批项目,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

2.激发消费活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确要求有关部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鼓励各县区积极筹划推出文旅消费新举措、新项目、新活动,以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消费,推动文旅产业振兴。例如:可通过集中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对文旅产品消费进行补贴、实施对部分景区门票减免优惠行动、开展

文旅主题系列活动等方式,引导扩大文化消费,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 (二)提升服务质量,创建优质旅游景区

1.着力打造特色文旅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依托凉州文化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档案方志等机构做好传统技艺、风情民俗、戏曲歌舞等非遗文化资源的梳理、保护传承及市场化开发利用。联合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文化枢纽精确提炼特色文旅“IP”热门元素,打造新型专项文旅产品。可持续擦亮“凉州夜市”品牌,搞活旅游夜经济,营造留客氛围,在城市公共设施中嵌入文化元素,恢复历史街区街巷传统地名,制作有关街巷来历传说故事的浮雕、纪念标志等,打造文化旅游娱乐新地标。

2.健全各类基础配套设施。将武威文化元素深深植入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打造具有“凉州印象”的菜肴饮品,建设文化主题酒店,提供特色交通服务。在特色景区建设文化长廊,提升景区文化内涵。推出文娱演艺活动,销售文旅特色商品,营造整个旅游目的地文化环境氛围,让文化通过旅游更好地走向市场,也让旅游更具文化魅力。同时,积极开展科技赋能,实施旅游数据中心及智慧旅游建设,逐步实现景区智能管理,切实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游览环境。

#### (三)深度挖掘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1.不断健全产业体系。健全完善文旅产业链体系,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发展思路,推动古浪县、天祝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实施“旅游+”战略,创新发展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融合产业,培育开发文化演艺、夜经济、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等新兴文旅业态,助力文旅市场加快复苏。

2.不断强化要素功能。积极创建铜奔马5A级景区,评定4A级景区1—2家,3A级景区2—3家。打造省级文旅振兴样板村4个,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1—2家,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个,精品民宿2家,星级农家乐10家。

3.不断激活旅游市场。持续开展“文化进万家旅游迎新春”百日攻坚行动和“武威人游武威”活动,推广短线游、周末游、休闲游、近地游,千方百计提振旅游消费,全力以赴激活旅游市场,力争全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30%以上。

#### (四)加大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品牌形象

1.强化网络媒体宣传。运用网络、电视等现代媒

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影响力高的特点,加大在央视、甘肃卫视、旅游网站的广告宣传力度,切实打响“天马故乡·醉美凉州”“沙海绿洲·绿洲碧海”“丝路要塞·红色古浪”“青藏之眼·绿色天祝”文化旅游品牌。积极与携程、途牛、去哪儿网、马蜂窝、美团网等媒体平台对接,对重点景区实现网络平台线上可查可约。

2.做好线下户外宣传。继续做好国内重点城市机场、车站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武威旅游宣传广告,在3A级以上景区、重点乡村旅游点以及客运站点建设旅游咨询中心,在旅游旺季免费发放旅游指南宣传折页,提升中国旅游标志之都的知名度。策划承办影响大、层次高的全国性、区域性节会活动,放大节会宣传效应,提升武威整体形象,扩大对外知名度。

#### (五)打造人才队伍,夯实发展人才基础

1.加大文旅人才培养力度。做好文旅人才的培养、引进工作,想方设法引进一些领军人才,加大对本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扶持力度。设立“名家工作

室”,组建文化和旅游新型高端智库。统筹推进各类文化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乡村振兴人才、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储备和培养文旅行业人才。

2.营造识才敬才良好氛围。实施一批文化和旅游人才重点项目,实施“文化和旅游青年拔尖人才”等支持项目,为重点人才提供科研经费、财政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加强文化和旅游人才平台建设,鼓励职业或技术院校调整优化文化和旅游相关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加强学校和文化旅游企事业单位合作,培养实践型文化、旅游和文物博物人才。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开展课题研究和设立专项资金,广纳各方良策高见。确定一批文化旅游人才培养院校和培训实践基地,积极探索政、企、学一体化,产、教、研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培育紧缺型文化和旅游人才。

责任编辑:邹平惠

(上接第61页)间的共同性和国家的统一性,那么就走向另一极端。南斯拉夫“对地方民族主义采取了一再妥协让步的政策,纵容了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断发展”<sup>[17]</sup>,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在对待“同”与“异”、“分”与“统”的辩证关系上,就要秉持和合理念——存异求同、存分求同,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案选择。

以和合为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内在于人性、内在于历史、内在于主体选择的生命本身。这种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自身本来就内在地蕴藏着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延续至今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世界向东看”的今天,在西方国家饱受族裔冲突进而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的现实背景下,和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必将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吕氏春秋【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墨子【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贾谊新书【M】.于智荣,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2002.

- [4] 幼学琼林【M】.冯国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5] 管子【M】.赵守正,译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 [6] 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 周易【M】.郭彧,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9]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1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1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9-28(2).
-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3]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 [14]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8-29(1).
- [15]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 [16] (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M】.胡传胜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17] 李小宁编.统一战线新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昊

#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 赋能我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万代红

2018年文旅融合以来,我省通过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实践与应用,打造了“一部手机游甘肃”综合服务平台,建成省级文化旅游大数据中心,联合人民网、新华网及腾讯、新浪等媒体和平台开展网络宣传推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落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多项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敦煌文旅集团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许多工作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突破。尤其是近年来,省里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全省智慧旅游建设的意见、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和“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智慧文旅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创新政策和举措,为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但从发展实际看,行业整体水平还比较低,数字化建设和科技赋能方面还有许多亟需破解的困难问题。主要表现为:

## 一、数字化基础建设有待提升

全省文旅行业数字化应用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智慧景区、智慧场馆、智慧酒店等尚未普及,文旅大数据采集来源单一,数据融合分析能力有待提高。一是旅游数字化建设、应用率低。对我省34个文旅行业主管部门和124个景区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县区尚未与“一部手机游甘肃”实时对接,124个景区大数据平台建设率仅25%,景区出入口闸机设备安装率仅25%,智慧停车场仅28%,有电子导览导游系统的仅26%,完全具备自动实时动态发布信息的仅9%。二是公共文化数字化能力弱。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还没有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已建有数据库的县区纳入非遗保护的

仅29%,文物保护的仅35%;长城文化、黄河文化、始祖文化、民族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没有通过科技手段全面展现出来。三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和服务市场能力不足。上海市在“文旅通”上搭建起对消费综合监测、旅游服务质量动态监测、宾馆综合监测等多个创新场景的智慧监管,实现了从“事中事后监管”向“预防式监管”的转变,而我省文旅部门依托现有数据资源,用于客流数据监测预测的只有50%,开展政务信息公开的仅35%,用于市场营销的仅为6%,开展公共服务发布和发挥应急指挥调度的都不足3%,在网络舆情监控、安全预警预报、旅游交通数据监测管理和项目管理考核等方面均为零。

## 二、科技创新体系还不完善

文旅科技创新载体建设能力不足,“政产学研用”的文旅技术创新体系还不健全。一是省内高校科研能力较弱、科技支撑不足。目前仅兰州大学建有1个文旅部旅游信息与数据保护重点实验室,西北师大、兰州文理学院等省属院校在文旅信息融合处理等方面缺乏有效载体,省级文旅实验室、研究中心建设相对薄弱;全国现有16所文旅部省部共建高校,目前我省没有一所高校跻身其中。二是数字化文创产品缺乏创新、供给不足。目前我省以地方文化元素开发的实物类文创产品表现为碎片化、同质化、低端化;以敦煌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等为主题的大型演艺IP旅游产品数量不多、创新不够、科技元素不丰富、在国内尚未形成较大影响力,比如河南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不断推出许多精品演艺节目,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而我省除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之外,缺乏后续创新和精品引领;博物馆、图书馆主要以展陈的方式进行展示,缺乏场景中引入沉

作者简介:万代红,女,九三学社甘肃省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浸式、智慧化体验;将传统文化IP融入年轻人“文创社交”产品的研发成果还不足,游戏、音乐、动漫、互动剧等新兴作品不多;元宇宙、数字虚拟人场景搭建及应用尚在起步阶段。三是有影响力的数字文创企业少、高端人才缺乏。作为国家级文创产业示范园,兰州文创园现有业态小、散、弱,科技引领作用不明显,敦煌文化产业园运行机制不顺畅,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大部分民营文创企业规模不大、影响不强、活力不足;目前全省规模以上文创企业具有国内竞争力的文旅科技创新企业数量较少,“专精特新”文旅科技型中小企业亟需重点扶持。四是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不足。陕西旅游集团2020年就投入2亿元研发及合作经费用于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项目的建设,而我省文旅集团从2020年到2022年三年期间用于研发投入仅1232万元。

### 三、文旅标准化建设差距较大

信息化、公共服务、新产品新业态与服务质量提升三大领域标准化体系需进一步健全。一是省级游旅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陕西省在2019年就成立了旅游景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而我省2022年1月才批复了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委员会,目前针对智慧景区、智慧酒店、旅游大数据安全与隐私管理三个方面制定标准。二是县域标准建设还基本处于空白。2020年四川省就开展了在县域智慧城市国家级试点基础上的县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指南标准的研制,并发布了《县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指南》和《智慧旅游饭店建设指南》两部省级地方标准,而我省县域标准建设还非常滞后。三是高端业态指导标准尚未制定。房车露营游、康养游、工业游、农业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及文化创意产品等系列文旅产品缺乏地方标准和标准化体系,使得文旅产业数字化建设质量不高、参差不齐。

我省“十四五”文旅规划提出:不断完善“一平台、一中心、三体系、三朵云”(即“一部手机游甘肃”综合服务平台,甘肃文旅大数据中心,智慧文旅服务体系、营销体系、管理体系和智慧文旅支撑云、功能云、内容云)智慧文旅建设总体架构,持续提升传播、体验和管理服务水平,为全省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建议:

#### (一)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发挥数字赋能聚合力

一是加大旅游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进一步完

善文化旅游“云、网、端”基础设施和景区智慧闸机安装等补短板建设,加快3A级以上景区数字化建设,建成覆盖全面、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的全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发展突出、创新应用成果显著的良好局面。二是优化数字公共服务。加快全省3A级景区、博物馆文物、非遗、图书馆、文化馆等资源的数字化转化进程,加快地方特色文化数字化发展建设;推动敦煌研究院大数据中心建设。依托各地政务云统筹规划建设省—市(州)—县(区)“多级一体”的文旅大数据中心,推动文旅企事业单位“上云用数赋智”。三是发挥数字“智慧”。加快形成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大数据对旅游产业运行的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能力,形成向下对接文旅数据底座,向上支撑各类应用场景的文旅智慧“大脑”,把监督前置、让管理兜底,支撑政府在行业监督、风险预警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实现对细分业务场景的灵活处置。四是加大资金投入。支持重点文旅项目申请中央、省里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化项目建设;统筹财政资金和政府投资工具,加大对文旅、文创、演艺、会展等领域的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设立文旅产业发展基金,激活“省绿色生态文旅产业发展基金”,发挥基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文旅市场“大资本”。

#### (二)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提升创新发展水平

一是加快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以兰州高新区、敦煌研究院两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作为全省文旅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引导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完善“政产学研用”的文化和旅游技术创新体系。加大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支持力度;增强省文旅集团、敦煌文旅集团等文旅头部企业在技术创新、数字化建设、文创产品研发方面的科技支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二是加大文旅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设。依托兰州大学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协同省内文旅相关专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的文旅创新技术力量,形成文旅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设机制;加大教育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激发文旅发展新活力。通过举办大学生智慧文旅作品创作大赛等方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加快省内旅游及相关专业的基础提升,集中力量打造一所文旅部共建高校。三是数字赋能提升文创产品价值。(下转第80页)

# 发挥法宝作用 助力追赶发展

——临洮县统一战线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王 涛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强县域行动,要求必须把发展县域经济摆在突出位置。市第五次党代会指出,要坚持统筹布局,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力壮大县域经济。随后,县委发出全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号召。全县统一战线积极响应,主动融入中心、摆进大局,通过发挥独特的人才、智力、资源等优势,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战线服务区域经济的属性不断凸显,两者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统一战线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全局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在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大有可为。应该充分发挥“法宝”作用,利用统一战线的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优势,把各方面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档加速。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智囊团”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智力优势、人才优势。新时代统一战线汇集了大量的、拥有各方面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资源,他们能够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才智。统一战线的“人才库”广泛分布在科技、金融、网络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减压阀”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任务繁重、挑战艰巨,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需要处理好平衡好各种关系。统一战线作为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可以画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同心圆”,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力量支持。

## 二、统一战线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在实践中,统一战线服务县域经济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思想引领难度增加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尤其是新媒体人士和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影响较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越发具有差异性、独立性、多变性的特点,这些特征使得统一战线工作难度加大,任务更加繁重。

(二)组织建设困难较大

在乡镇层面,还存在对统战工作认识不足的现象,存在“上热、中温、下凉”的问题。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基层统战力量也亟待加强,缺乏专业的统战干

作者简介:王涛,女,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

部,身兼数职的工作队伍很难保证统战工作做细、做实。在县级层面,统战对象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联系相对松散,流动性强、构成复杂,这给基层统战组织建设带来很大的压力。

### (三)平台搭建不够合理

平台和载体是统一战线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保障。有了平台和载体,统战工作才有抓手,才能在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取得实效。目前,县级统战工作平台主要有工商联以及各类别统战对象组建的联谊会、商会等,这些协会、组织在推进经济建设方面作用发挥还不够明显。

### (四)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大统战”格局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重要基础。从我县情况看,统一战线机制建设尚不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还不够完善。统战工作督导考核还缺乏硬性标准,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地位,影响统一战线作用发挥。

## 三、统一战线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 (一)以“三个坚持”强化服务理念

1.坚持把“凝聚人心”作为统战工作服务县域经济的关键点。“人心和力量”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始终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领导覆盖统一战线各领域、贯穿统战工作全过程。依托县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发挥,进一步加强人员配备和工作保障,并将统战工作纳入主体责任述职内容,与党建、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建设等“传统项目”看齐开展述职评议,切实推动统战工作责任落实到位。2022年临洮县共举办统一战线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及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等专题研讨班10多场次,培训500余人,开展“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等教育实践活动10余次,深入各界、各领域开展统战民族宗教政策大宣讲100余场次,完善联谊交友制度,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与27名党外代表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联谊交友,把思想政

治工作融入日常,持续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2.坚持把“服务大局”作为统战工作服务县域经济的着力点。通过对各领域统战工作进行整体设计和统筹规划,从而实现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与县域经济发展中心任务的有效对接、精准契合,使统一战线的优势更加聚焦,作用更加凸显。重点围绕汇聚以下“六大力量”开展工作:做实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组织各民主党派聚焦融入全省“一核三带”区域发展布局和实施“六县战略”开展建言献策,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汇聚“民主力量”;深入开展“沿洮河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升线”行动,加强服务和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支持少数民族聚居村社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汇聚“民族力量”;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推动中国化示范活动场所建设,实施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831”工程,深入开展“党亲国好法大”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着力汇聚“宗教力量”;鼓励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各自专业特长,聚焦科技、金融、网络等重点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汇聚“新兴力量”;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临洮行动,培育和发发展异地商会,动员临洮籍在外企业家积极参与“归雁工程”,加深乡谊亲情,着力汇聚“非公力量”;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擦亮“侨聚临洮”品牌底色,着力汇聚“爱国力量”,进一步推动形成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生动局面。

3.坚持把“以事聚人”作为统战工作服务县域经济的切入点。以深入实施“破冰塑形”聚力工程为抓手,突出“以事聚人”主题,发挥统一战线“统”“战”“广”“新”优势,着力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临洮的生动实践中彰显“统战之为”。一是建设“绿满陇中·统战同心林”基地。积极动员全县各民主党派成员、非公经济人士、民族宗教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广大统战成员参与基地建设,主动对接联系省市统战系统及青岛市市北区统战资源,共募集资金103425元,树苗4100余棵,春秋两季在连儿湾乡王西湾村绿化造林200余亩。二是全面推进“万企兴万村”临洮行动。确定县内326家经营主体与323个行政村结成帮扶对子。截至目前,企业共投入帮扶资金1687.96万元,带动建成边家湾

村、马家窑村、党家墩村、三益村、后地湾村等一批省市级美丽乡村。三是组织开展“消费助农”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统一战线共采购西瓜 124 吨、玉米 8.82 吨,洋芋 53.13 吨,水蜜桃 33.33 吨,各类蔬菜 10 吨,累计消费金额达 60 多万元。

## (二)以“三个依托”提升服务效能

1. 依托民营企业,树立服务经济的典型。民营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县民营经济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制定出台了《临洮县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站工作机制》,并在甘肃汇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等 5 家重点民营企业挂牌成立第一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站。工作站运行以来,协调行业部门解决问题 4 个。另一方面,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事迹,在县融媒体中心刊发展示企业家风采、专题举办了“履责担使命 奋进新时代——临洮民企风采图片展”,进一步加大对优秀企业家和优秀企业的宣传力度。

2. 依托新生代力量,抓住服务经济的关键。“留学人员、党外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一战线的新生代力量,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县紧紧依托省委统战部“三合一”实践基地这一优势平台,通过建基地、搭平台、创品牌,把人才智力、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项目推动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起来,全力打造党外知识分子、归国留学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新亮点。同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基本情况专题调研,组织开展参政建言、调研考察、交流学习、社会服务等活动,跳出最初定位于“志愿服务”的小圈,融入多领域服务中心的“大圆”,更加注重与县委中心工作、与统战重点工作“双融合”,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商会协会团体组织,扩大服务经济的范围。目前,工商联等团体组织日益成为党和政府联结工商界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商会协会组织兼具统战性、民间性和经济性特点,具有很强的整合功能,是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最广泛、最经常的渠道。我县

把工商联、行业协会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实施“1+8+18+N”建设工程(“1”即:加强县工商联建设,“8”即:推动建筑、房地产、建材、交通、水利、文旅、自然资源、农业等 8 个行业商(协)会的建立和完善。“18”即:建立和完善 18 个乡镇商会,推动乡镇商会建设全覆盖。“N”即:建立多个特色商会。)多方面、多角度组织商(协)会开展联谊交流、经贸合作,着力培育一批有分量的、有担当的商会协会组织,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服务范围,有效协调政商之间的关系。

## (三)以“平台建设”增进工作实效

1. 搭建教育培训平台。做好教育培训是新时代统一战线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一是搭建教育培训平台。邀请知名教授、企业家来我县开展“民企健康大讲堂”活动,分期分批对骨干民营企业进行集中培训;每季度组织民营企业企业家赴外学习考察、参加节会,进一步开阔视野、转变理念,增强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信心。二是探索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锻炼基地。先后成立了临洮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电商创业实践基地、幼儿教师培训基地、新媒体创业实践基地、“石话党历程”主题展览馆等教育培训基地,搭建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的新平台。三是开展公益技能和专业技术培训。积极衔接青岛市北区以及省市统战资源,开展美育师资、农业技术等专业培训 6 场次,为县域经济发展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搭建招商引资服务平台。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历来是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通过组织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活动,充分激发在外乡友回乡兴业的热情,开辟更多的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人才回引等渠道。鼓励县内企业参加各类“寻商”活动,通过企业宣传推介,积极寻找商机并引进互利合作项目,形成连锁效应和群体效应,为追赶发展增添新动能。

3. 搭建咨政建言平台。咨政建言、出谋划策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本职能。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围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搭建咨政建言平台,引导党外人士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中的专家学者当好“智囊团”。一方面,以课题研究为抓手组织民盟临洮县委、



农工党、民革分别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洮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绿色长廊经济带建设”开展监督性调研。另一方面,利用各类座谈会、协商会等载体,对县域经济发展涉及的政策措施进行协商讨论,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4.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建立政商沟通平台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工商联、商(协)会的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定期开展由经济、企业、工商、财税、金融、司法、环保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政商联席会议,使企业和政府就政策走向、法规制定、企业经营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通过微博、微信等群众使用广泛的平台工具构建起政商间的“朋友圈”,将关乎企业切身利益、关注度高的信息及时发布,与“朋友”分享,真正实现零距离沟通。

#### (四)以“机制创新”激发工作活力

1.完善组织工作统筹机制。新时代统一战线应根据服务县域经济的任务要求调整工作重心,谋划工作思路。要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好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议大事、各项协调机制抓日常工作体系,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齐抓共管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探索建立联动机制,纵向上,主动对接联系省、市统战资源,

(上接第76页)

通过对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红色文化IP为代表的挖掘与转化,充分运用MR/VR/AR、元宇宙等技术,打造“N+1”(新技术+旅游产品或业态)的产品组合,实现文创资源从“静态展示”转向“活化传承”,以数字化方式诠释甘肃的自然风貌、人文历史与社会传承,增强科技赋能文旅的力量;加快传统文创产品的升级转型,打造行业品牌;深度挖掘富有甘肃符号的动漫、游戏、宣传片等,运用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IP圈粉年轻观众,让90后、00后走近传统文化,树立新时代文化自信。四是打造文旅科技型龙头企业。以甘肃文旅科技有限公司、敦煌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为带动,培育一批具有国内竞争力的文旅科技创新企业和园区,通过政策、市场、金融支持,打造一批“专精特新”文旅科技

加强与青岛市北区统战系统的沟通联系,共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横向上,充分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协同作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建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新时代统一战线要运用网络统战的影响力和大数据优势,配合网信部门建立起网络舆论引导机制。要实时监测舆论导向,掌握舆论态势,做好突发性舆论的引导预案。要掌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舆论支持。要加强对网络意见人士的引导与规范,充分发挥网络意见人士的作用,讲好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奋斗的“临洮故事”。

3.建立人才吸纳培养机制。相比于政府部门,统一战线在吸纳各级各类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我们着眼统战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把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纳入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积极储备后备人选,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同时,对政治素质好、社会影响大、议政能力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外人士,积极推荐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在知联会、新联会、商协会担任职务,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闫丽红

型中小企业。

#### (三)加快标准化体系建设,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一是完善标准体系。在文旅信息化、公共服务、新产品新业态与服务质量提升三大领域制定标准化体系。加快立项和出台我省《智慧旅游饭店建设指南》和《县域智慧旅游城市建设指南》等省级地方标准制定;积极推进房车露营游、康养旅游、研学游及文化创意产品等系列地方标准。二是构建运营机制。建立健全标准化工作机构,组建省级文化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形成由政府部门、行业专家、企业三方协同推动标准立项、编制、宣贯、实施、反馈、修订、废止的工作机制。

责任编辑:常海哲



## 来稿格式规范

我院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来稿。为使来稿得到迅速与妥善的处理,敬请作者注意如下要求。

一、来稿应依次包括:主题、作者简介、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如是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编号。

二、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职务、单位全称、通讯地址、邮编、电话。

三、参考文献统一格式

1、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例如:[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1):56-58.

2、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3、报纸类:[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4、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5、学位论文:[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1]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2]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例如:[1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序号]原著作者.书名[M].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0.

9、电子文献:[序号]电子文献作者.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其中,【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为:【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例如:[15]学术堂.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要求【EB/OL】.

<http://www.lunwenstudy.com/cankaowenxian/130239.html>.2018-03-14.

四、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放在加注处右上角。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